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0年10月30日第163期

本期目录

【宁夏文革专辑】

史林一叶

杜钧福 宁夏文革述略

余汝信 康健民率部入宁

浩劫墓碑

不平 文革中的宁夏英烈

【史林一叶】

宁夏文革述略

杜钧福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于1958年，1966年文革开始时辖固原专区和银川市、石嘴山市以及一些直辖县。固原专区的西吉、海原、固原三县合称西海固，是全国最贫困地区之一。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兼政府主席杨静仁。宁夏军区司令员朱声达。

在文革研究中，海外学者武丽丽、赵鼎新的论文《“克里斯玛权威”的困境：宁夏文革的兴起和发展》是一篇代表作。作者经实地调查，掌握了比较翔实的材料，从毛泽东的“克里斯玛权威”和地方官僚、群众组织之间的关系研究银川地区文革运动发展的内在逻辑。近年来，宁夏地方机构和学术界做了不少资料积累工作，出版了一些专著，如中共银川市委党史研究室、银川市档案馆编辑的《中共银川党史大事记》、张远成著《当代宁夏简史》、徐永富主编《宁夏五十年：1958-2008》、编写组编《当代宁夏纪事》和宁夏国史编辑委员会、宁夏国史学会

编辑的《当代宁夏史通鉴》，对文化大革命及文革前的政治运动均有比较简要的概括。张进海主编《当代宁夏日史》的第三卷逐日叙述 1966–1976 年文革期间的宁夏历史，是一部详尽的大事记。¹有关民间资料如回忆录、博文比较缺乏，多集中在一些重大事件上。

一、文革前的政治运动

“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运动”

宁夏回族自治区于 1958 年 10 月成立后，政治运动就从未消停过。1959 年 7 至 8 月的庐山会议后，全国开始“反右倾”运动。宁夏继“反右倾”后，于 1960 年 5 月开展了一场主要针对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刘格平的“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斗争。之所以如此安排，是因为国内从 1957 年就提出了“反对地方民族主义”问题。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前的 1957 年 7 月 5 日，《银川日报》曾发表题为《地方民族主义必须批判》的社论。1958 年 8 月 17 日至 9 月 6 日在银川召开回民座谈会，对身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西北民族委员会委员、固原回族自治区州长等职的伊斯兰教哲赫忍耶沙沟门宦教主马震武进行了为期 22 天的大规模批判，将其定为“反革命极右分子”，打击了传统的教派门宦制度。马震武于 1960 年殁死狱中，文革中墓地被平毁。

刘格平是河北孟村回族，早年参加革命，曾任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统战部副部长，参与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筹建工作，在民族问题上持比较务实的立场，对 1958 年开始的所谓“宗教改革”运动予以抵制。早在 1950 年，在他和乌兰夫发表的《对新疆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意见》中就建议对此类问题采取慎重的态度²，在处理新疆和大小凉山民族事件中的具体做法也为毛泽东所肯定。他对民族问题的主张集中表现在 1959 年宁夏穆斯林协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中。他不赞成动员回民养猪，同意并寺，但说不要并得太多。阿訇应该信主，应该过古尔邦节。一些民族习惯如妇女装束可以保留。信主和不信主可以合作，宗教可以起好作用也可以起坏作用。³他还对银川的建设提出并施行一个方案，即老城不动、建设新城，还率先把区党委机关搬到新城。这个城市规划的思路实际上对全国各城市包括北京的城市规划都是有借鉴意义的。

引起他挨批的导火线，据说是他和夫人丁磊主持设计了一套新颖的回族服装，并且叫参加 1959 年 9 月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和 10 月 1 日国庆活动的宁夏代表

¹ 陈卫鹏、马宝妮《当代宁夏史与口述史研究》，《宁夏史志》2010 年 6 期。

²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276 页。

³ 佚名《不一样的红色记忆：回民的红色记忆——深切缅怀刘格平》，穆斯林在线，2018。

团穿着这套服装游行，引起北京上层的注意。这是因为中央的政策是尽量缩小民族间差别，不要凸显民族特点。1960年3月，“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就找他谈话了。3月30日到4月26日，中央在北京召开有关问题的座谈会，有统战、民委方面负责人参加。刘格平也在会上阐述了自己的意见。

1960年5月3日到7月2日，宁夏区委举行扩大会议，指责刘格平及一些领导干部“反对开展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反对改革宗教中的压迫剥削制度”，将他们打成“地方民族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和民族宗教上层在党内的代理人”。5月17日，自治区党委书记汪锋在全区文教群英会上作了《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提出要在全区开展“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教育”。9月13至15日，在自治区人大会议上免去刘格平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王志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李微冬、马思义人民委员会委员的职务，由中央工作组组长、国家民委副主任杨静仁继任自治区书记处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在这场运动中，有13名厅局级回族干部被打成“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并牵连更多的干部。刘格平被解职后到中央党校学习。王志强降职为交通厅长。宁夏建工局局长丁毅民等四人被逮捕法办。¹宁夏军区副司令员牛化东也受到牵连。

这次运动的基调是“民族融合论”。当时下发的一篇内部资料中说：“地方民族主义分子，人为地制造民族隔阂，害怕民族亲近，反对民族融合。”²

这场运动持续时间长，影响深远。直到文革已经开始的1966年5月，宁夏一些地区仍在学习中央统战部《关于李维汉同志在民族工作方面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报告》，继续进行“民主革命补课”运动。³

“反对坏人坏事”运动

在进行“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运动的同一时期，宁夏自治区党委从1960年9月起发动了“反对坏人坏事”运动。

事情起源于石嘴山钢铁厂的一份调查报告《关于石嘴山钢铁厂当前的问题和我们的意见》。这个钢铁厂是1958年“大跃进”的产物，问题自然不少。报告根据1960年8月的调查结果断定厂里一些生产上的问题是“坏分子专政”造成的，建议厂里集中力量打击坏人、纯洁队伍。他们认为，当初宁夏是由于马家军起义才被“解放”的，一些坏人未被清理，如不及时除掉，遇到什么天灾人祸他们会乘机出来闹事，所以必须先下手为强。

在上报中央以后，8月30日自治区党委决定在全区开展“反对坏人坏事”

¹ 唐志军、张欣《宁夏“反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运动始末》，中国邮政绿色驿站网，2007。

² 张远成《当代宁夏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88页。

³ 《当代宁夏日史（1966.5-1976.10）》，黄河出版传媒集团、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24页。

运动，并下达捕人指标，和“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运动合称“双反”，分别整群众和整干部。

这两个运动，特别是“反对坏人坏事”运动，斗争对象意义含混、政策界限不明，施行结果是将很多无辜群众打成“坏人”。有些企业甚至宣布要把“调皮捣蛋的、吊儿郎当的、能说会道的、经常旷工的都要搞起来”。在运动刚开始的20天内，就逮捕了7032人，劳教了2722人。¹

全区在“双反”运动中被打击了27000人，判刑3263人，数以千计的人死亡或失踪，很多人死于狱中。其中绝大部分是基层干部、工人、农民，从外地来的支援建设人员和知青占很大比例。²

其中有些罪名极其荒唐可笑。例如有几个刚参加工作的学生在黄河里游泳，他们爬上岸来，看见石嘴山钢铁厂的高炉，其中有一个人喊：“同志们，目标正前方，冲啊！”于是几个人狂奔而去。这个为首喊冲的学生以“炸高炉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由于政治运动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闹得民不聊生，再加之“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发生大面积饿死、外逃的“中宁事件”³。1962年在肯定“双反”运动的前提下，对一些人员和案件进行了甄别，局部纠正了错误，在农村也调整、落实了某些政策。

但是，这两个政治运动，特别是“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运动，由于两方面原因，在文革中来了个剧情大反转：一是当时领导和主持这个运动的中央统战、民委部门的一些负责人在文革前或文革中被打倒，原统战部长李维汉在1964年就已下台，他主持的统战工作被全盘否定。当时主持“双反”运动的汪锋调到甘肃后在文革中被打倒，继任的杨静仁也在宁夏文革中落马。另一方面，曾因“地方民族主义”遭到打击、文革前已经调到山西的刘格平，则因被树为党史上“六十一人”案中坚强不屈的典型，又被中央委以重任，被授意在山西夺权。

这种“好人”和“坏人”位置的对调，自然要求有个说法。于是在1968年7月25日自治区革委会向中央上报关于“两反”运动复查平反的报告。1971年2月16日他们又给中央呈送《关于“反地方民族主义”政治陷害案的复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提出刘格平未复查、马思义由军区处理，其余被“陷害”的王志强、李微冬等11人平反、撤销处分，恢复原有职务或级别。

但是，在群众层面，政治运动中有受害者也有加害者。这样一反复，涉及很多人的切身利益，成为驱动文革中派别斗争的重要因素。

¹ 张远成《当代宁夏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90页。

² 《当代宁夏史通鉴》，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106-107页。

³ 张远成《当代宁夏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93-95页。

“四清”运动

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宁夏正在进行“四清”运动。宁夏的“四清”于1963年7月开始在农村局部试点，10月在一些地方开展面上的运动，同时在城市开展“五反”。1964年11月，宁夏第一期“四清”在永宁县等地全面铺开。1965年10月和1966年5月相继开展了第二期和第三期“四清”运动。1966年文革开始后，一些地方的“四清”停止进行，一些地方的“四清”工作组转为文革工作组。在这些地区和部门，正如银川氮肥厂一位技术人员所说：“用‘四清’应对文革，占据文革空间。能坚持一天算一天。”“四清是点”，主要整基层，而“文革是线”，从下到上。¹

196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曾发一个《关于保卫四清运动成果的通知》，遏制对“四清”的否定意见。但“四清”运动造成的社会矛盾在文革中继续发酵。例如在中宁县的中宁中学，“在由校内文化大革命转向校外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中宁中学揭批‘四清’运动极左行为的活动并没有结束。‘铁扫帚’战斗队抄了校‘四清’档案与学生档案，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机密终被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这些“机密”内容的典型例子是背地里给学生档案中盖上“不宜录取”的章，取消了他们考上大学的机会。这当然促使这些受害的学生在文革中奋起反抗这种罪恶的制度。²

二、从派工作组到夺权

文革开始和红卫兵运动

在1967年夺权阶段前的宁夏文革运动大致与其他省市无很大区别，符合一般规律。

宁夏的最高学府是宁夏大学，成立于1962年。在1963年的“五反”运动中，有10名教师被定为“反动教师”，进行无情斗争、残酷打击，闹得人人自危。文革开始后，这些教师再次遭到摧残。³

聂元梓等人大字报公布后，宁夏大学中文系9名学生也贴出题为《检查我校领导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精神状态》的大字报，震动全校。6月4日自治区党委派遣3人工作组进驻，也相继派遣工作组进驻其他大专学校和中学。宁大工作组于5日召开大会号召向牛鬼蛇神开火，并召开干部会议进行具体部署。从此在全校

¹ 高永海《跳进黄河》，天涯论坛，2014。

² 佚名《文革纪实：黑材料显性记》，地方文革史交流网。

³ 塞翁《大漠悲歌》，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07。

开始揪斗老师，甚至揪斗学生。在工作组时期，83%的老师和基层干部遭到了大字报的批判，42%的教师和59%的干部划为坏分子被批斗。¹学校又将“五反”时积累的材料拿出来整人。送进劳改队的干部、教师直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之后的1967年夏才获得解放。

6月16日，《人民日报》揭露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镇压学生运动事件，并发表题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的社论，鼓舞了学生们的热情。18日宁夏大学学生在宁夏日报社门口贴了一张批判宁大党委书记江云的大字报。此后江云被自治区党委安排到外地躲避。7月5日，宁夏大学工作组扩大为工作团，人数增加到58人。

在文革群众运动阶段开始的一个月里，普遍发生群众和工作组冲突事件。6月6日，平罗县平罗中学部分师生给县委贴大字报，县委向几所中学派出了工作组。6月8日，青铜峡水电厂工人给“社教”工作队贴大字报，被列入“黑名单”遭到追查，是为“六八事件”。6月12日，银川师范学校学生贴大字报要赶走工作组，被打成“反革命”遭到围攻，是为“六一二事件”。

在大专学校教师遭到迫害的同时，1966年7月宁夏各地开始对中小学教师集训。例如中宁县于7月12日集中全县中小学教师集训，将78名教师、校长及主管教育干部戴高帽子游行，直到8月中旬结束。7月23日自治区党委正式对中小学教师集训做出决定。固原县集中1000多名教师和文化单位人员举办两个月的学习班，批斗教师396人，将135人打成“反革命”或“坏分子”。²

7月22-28日，银川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按照自治区党委会议精神，传达刘澜涛、杨静仁在西北局会议上的发言，研究了银川市的文化形势。会议批判了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吴生秀、罗成德，常委兼统战部长刘震环、宣传部副部长兼文教厅副厅长杨辛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还将银川市市委书记冯茂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7月25日又将银川市公安局副局长李振邦定为“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党，逮捕法办。9月3日，经中央批准，令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李景林停职反省。

8月4日迫于国内形势的变化将各校工作组撤销，但各校工作组扶植的文革委员会继续掌权。

北京的红卫兵运动在“红八月”里很快影响到宁夏。银川各大中学校也开始组织红卫兵。9月18日成立全市性的“红卫兵总部”，只收“红五类”子女，并热衷于“破四旧”。一开始是学校、商店、街道改名，继而焚毁古书、破坏古迹。海原县在几天内就有67座清真寺、3座拱北（伊斯兰教导师、先贤等人的墓葬）、17座庙宇被拆毁。9月1日，中宁县委上报《关于拆除牛首山寺庙的请示报告》，

¹ 武丽丽、赵鼎新《“克里斯玛权威”的困境：宁夏文革的兴起和发展》，《二十一世纪》2007年3期。

² 《当代宁夏日史（1966.5-1976.10）》，黄河传媒出版集团、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26-31页。

被批准执行。吴忠县在此期间拆除了 87 座清真寺、77 座庙宇，对著名宗教人士马腾霁进行批斗，几百户人家被抄家。¹在服饰上大家一律改穿颜色灰暗的中山装，回族妇女摘下手镯和耳环，男人剃掉胡须。

后来又发展到随心所欲的抄家活动，将所谓五类分子抄家和赶回农村。农村的四类分子被批斗。将四类分子赶回农村在宁夏实为官方行动。在 1966 年 5 月 6 日，自治区党委就下发了《关于将城市四清中清理出来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安置到农村进行改造的通知》，并付诸行动。²

1966 年 9 月 20 日至 30 日，自治区党委开会布置“迁赶”工作，确定“迁赶”的对象主要是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于是银川市“红卫兵总部”发布头号通令，勒令 2197 人及随迁家属 4353 人，限期 3 天迁出城市，到农村接受监督劳动改造。³迁出人员大多被送往固原、海原、隆德、泾源等偏远地区，只有少数允许回原籍。石嘴山市根据市委布置和“红卫兵总部”通令，驱逐 1551 人，其中随迁家属 1013 人。⁴

在银川氮肥厂，8 月“十六条”公布后，临时行动小组（文革筹备小组前身）批斗了两名曾经戴耳环、穿旗袍的女工。9 月 28 日，驻厂“社教”工作队和党支部决定把 10 名出身不好的职工遣送农村劳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后，他们中大部分回厂恢复了公职，并参加了造反派。⁵

就是在固原这样的地方，从城市迁出人员绝对不可能被安置在条件较好的县城，因为当地的地富也被驱赶。“1966 年 9 月下旬，固原大肆拉黑五类，把黑五类本人连同他们的父母妻儿都吊销户口，驱赶出城，发配到贫穷落后的山村里。即使你的父母已年过八旬，即使你的子女尚在襁褓，即使你的家人病重在床，也一律‘格拉无论’。”⁶

造反运动的兴起

8 月下旬逐渐有北京的红卫兵到宁夏串联，其中不少是宁夏籍的。他们开始煽动造省市领导的反。8 月 22 日四名北京中学生在银川街头贴出十几张大字报，提出“用毛泽东思想衡量宁夏自治区党委”。晚上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杨静仁接见了部分北京红卫兵。8 月 23 日银川市召开中等学校文革动员大会。银川“社

¹ 《当代宁夏日史（1966.5-1976.10）》，黄河传媒出版集团、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35-36 页。

² 同上，21 页。

³ 芦学舜《银川市破“四旧”、立“四新”运动简述》，银川党史网，2014。

⁴ 《当代石嘴山日史》，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97 页。

⁵ 高心海《跳进黄河》，天涯社区，2014。

⁶ 流水潺潺博客《红袖章补了破袜子》，2007。

教”工作团负责人在会上做了检讨。杨静仁检查了派工作组问题。8月25日自治区党委在银川召开10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

北京红卫兵的举动鼓舞了当地造反派学生。9月2日，宁夏大学一些造反派师生召开全校批判大会，批斗校党委书记、校长江云并指责自治区党委，要求原工作组长和江云的秘书前来对证。自治区党委不允，导致宁大学生聚集到党委门前抗议，称为“九二行动”。9月3日自治区党委宣布江云已被中央免职。此时学生队伍开始分裂，但造反派只占少数。此后官方开始反击，否认工作组犯方向路线错误，并组织大字报攻击造反派学生。

银川造反派在北京红卫兵的支持下，策划了更为激烈的行动。银川大学“革命串联队”于9月21日贴出大字报，号召在25日召开“揭露宁夏自治区党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会”，得到20多个单位的造反派的响应，并组织了大会筹委会，不顾自治区党委的阻挠，大会如期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兼自治区副主席马玉槐、自治区党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杨一木和自治区副主席陈养山被点名批判。会上同时也出现了如“杨静仁是宁夏牛鬼蛇神的大红伞”、“宁夏区党委是黑线黑帮”等口号。会后，出现了针对杨静仁和自治区党委的大字报。

9月下旬，宁夏大学造反派学生在北京红卫兵帮助下，冲破官方的阻挠上京参加国庆活动，回来后带来中央鼓励造反的精神和各地运动信息。10月初开展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和10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传达使造反派组织迅速成长。10月中旬宁夏大学造反派学生退出“红卫兵总部”，并组成“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大量被老红卫兵排斥的学生加入了这个组织。他们继而和学校其他造反组织组成“联合总部”以协调行动。不久，银川市的中学红卫兵也组成了区市级联合组织。11月银川市形成以行业为基础的造反派组织。11月20日保守派的银川“红卫兵总部”被捣毁。

宁夏大学造反派领袖安建国是文革前的学生会主席，在“四清”运动中就与工作组意见相左被排斥，文革开始后得以翻身，后来成为全自治区造反派组织“总指挥部”的领导人。宁大另一造反派领袖杨长春是复员军人、中文系学生。该校干部子弟、银川市长冯茂的弟弟冯贤也成为造反派领导人。

由于“四清”运动打击了部分工人群众，从8月起一些工厂的造反运动就开始萌发，但受到自治区党委的压制，不允许成立群众组织。直到12月9日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后，工人造反派才组织起来。保守派也成立相应的组织与之对抗。到了12月中旬，群众已充分发动起来了。

“与其它省市相似，银川的保守派和造反派在成员构成上具有明显的不同。保守派有‘五多’：红五类多，党员多，团员多，干部多，积极分子多。他们是文革前秩序的受益者。造反派中则包括了从红五类到黑五类的各种人，其中有不

少是历次政治运动中各单位的受害者或受牵连者，特别是在宁夏的‘反地方民族主义’和‘反坏人坏事’运动中和文革初期的受害者。”¹

到11月造反派集中攻击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副主席马玉槐。12月11日，杨静仁代表自治区党委作检讨，承认自治区党委在工作组问题、对待群众组织问题和串联问题上犯了错误。15日至16日，宁大红卫兵要求杨静仁罢马玉槐的官，并于16日下午强行将马玉槐带到北京。中央责成杨静仁和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甘春雷赴京处理马的问题。在北京，当中央表示明确支持造反派学生后，甘春雷转而支持学生，并对杨静仁进行了揭发。

此时自治区党委机关干部也开始造反，1967年1月上旬20多名局级以上干部在丁毅民领导下成立“倒海翻江战斗团”，继而成立机关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公社”。11日自治区党委机关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1967年1月12日，宁夏造反派召开了批判杨、马的大会。15日，宁夏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联合指挥部”、“银川地区工矿企事业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及首都“三司”驻宁联络站等群众组织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经济主义”大会，当场批斗了刚从北京回来的杨静仁、马玉槐，会后游街示众。18日陈毅接见宁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明确提出杨、马应被打倒。²当时称杨静仁、马玉槐为“大杨马”。另有“小杨马”即自治区候补书记杨一木、自治区副主席马信也被打倒。自治区党政机关完全瘫痪，未完成“四清”的地区的工作队纷纷撤离。造反派积极准备夺权。

夺权

1967年1月，从上海、山西等省市刮起“一月风暴”波及全国。《宁夏日报》得风气之先，于13日夺了权。1月中，银川各造反派组织开始酝酿夺权。1月18日到25日银川造反派组织先后召开5次筹备会议讨论成立夺权组织。1月25日，“银川地区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发布“紧急通令”，号召造反派团结起来，开展全面夺权斗争。26日“宁夏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简称“联委会”）正式成立，宁夏军区表态予以支持。27日，银川市体育馆举行庆祝“联委会”成立大会，宣称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夺了自治区党委、人委，银川市委、人委等党政机关的权，大会通过了“夺权公告”。此为“一·二七夺权”。

他们按照中央肯定的“三结合”原则组织领导班子。他们结合的领导干部代表是原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甘春雷，宁夏军区派来了副司令员张怀礼，造反派代表则由“联委会”负责人、宁夏大学学生领袖安建国、区委干部牟元礼担任。

¹ 武丽丽、赵鼎新《“克里斯玛权威”的困境：宁夏文革的兴起和发展》，《二十一世纪》2007年3期。

² 同上。

这次夺权准备得比较仓促。1月17日在13个群众组织讨论夺权的会上就出现不同意见。北京“三司”联络站反对立刻夺权，说条件不成熟，还应该乱一阵。接着中学生代表也持异议并退出会场。他们原定29日夺权，但是风闻保守派也准备夺权，于是提前到27日。

2月1日“联委会”发出《第一号通令》，命令自治区党政机关处级以上干部到“联委会”登记、听候处理。4日发布《第二号通令》，宣布财经大权一律归“联委会”掌握，抄家所得物资一律归公。此后，自治区一些党政机关和各县也实行夺权。

夺权后，向中央上报几日没有回音，“联委会”合法性受到质疑，并未实际掌握权力。首先造反派内部就发生纠纷。1月31日，宁夏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联合指挥部”和首都“三司”驻宁联络站在银川体育馆就夺权问题进行了辩论，分歧公开化。2月8日，反对夺权的银川郊区浙江下乡知青造反组织“劳大红旗”一些人砸了“联委会”办公处。劳大就是原来的农业技术学校。因为他们受到北京“三司”支持，晚上“联委会”召开大会声讨，并把北京“三司”驻宁联络站驱逐出境，拘留了“劳大红旗”的一名成员。

这件事的背景是在造反夺权情况下，如何对待文革前的“双反”运动中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的问题。由于当年主持运动的杨、马均已被打倒，一些中央首长也提出批判文革前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这些受迫害者的平反自然应提到日程上。但是夺权前夕在领导干部和群众组织间进行联络、并参与“三结合”的干部代表是甘春雷，而他是当年积极领导“双反”运动的干部之一，当然引起一些当年受迫害的造反派的怀疑和反感。从浙江来的知识青年是在“反对坏人坏事”运动中受害最重的群体之一，由他们出面砸“联委会”就很容易理解了。这些浙江青年还组织了个“双反联络站”，专门调查这两个政治运动的受害者。

2月4日银川市“社教”工作队召开批判大会，遭到另一派的冲击，说明对待“四清”运动也有彼此对立的看法。

在造反派内两派决裂的背景下，成立了几个反对夺权的组织，如中学生的“西北野战军”、宁夏大学的“北京公社”、工人组织“五四战团”。他们对“联委会”的夺权提出批评。但“联委会”不但不接受他们的意见，反而压制他们，所以他们攻击“联委会”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有一些人退出“联委会”，组织了不同观点的多个组织，形成复杂的政治局面。

军区的转向和反复

宁夏军区本来和自治区领导阶层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也曾在造反热潮中将一

些受到攻击的领导人隐藏在军区免遭群众批斗。1月27日夺权发生时，他们不了解全国形势，就按照1月23日发布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文件精神和报纸上的主流舆论支持了夺权。

1月28日军委“八条”发布。其中提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在这之前，1月26日在新疆发生石河子流血事件，造反派遭到屠杀。2月初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总后青藏办事处副主任张晓川违背军区司令员刘贤权意志开始使用武力对付造反派。在这背景下以朱声达为首的宁夏军区改变了立场，转而对“一·二七夺权”持否定态度。

但是转这个弯子总得有点借口或导火线，上述驱逐北京“三司”联络站事件是其一。另外有一名《解放军报》记者，当时公开身份是中央文革小组联络员，在当地采访时和一名“联络站”下属机构人员冲突，盛怒之下到军区抱怨不应该支持夺权。

2月9日，军区党委会开会，军区司令员朱声达陈述造反派夺权中的问题，将其上纲为“假夺权”、“右派夺权”、“资本主义复辟”，导致这次会议做出撤销支持夺权的决定。2月10日晚宁夏军区派部队进驻《宁夏日报》社，宣布进行军管，与“联委会”发生直接冲突。2月11日，宁夏军区发表《关于撤销对“宁夏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一切支持和援助的声明》，并随后成立支左办公室和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行使原自治区政府的行政权力。12日宁夏军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发表公开信，称“一·二七夺权”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所操纵的临时拼凑的大杂烩夺权”。“联委会”方面立即反击，于13日发表声明谴责军区的表态，贴大字报制造舆论，并在体育馆召开大会，批判军区的声明。¹

2月19日，军区发表《告全区革命人民书》，指出“区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和“联委会”一小撮头目相勾结，破坏文化大革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并宣布“联委会”的五大罪状，号召群众与其坚决斗争。22和23日，“联委会”两次召开控诉军区大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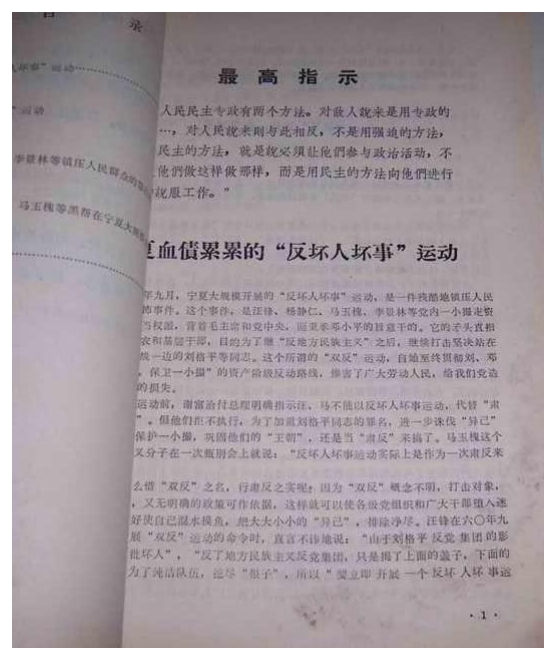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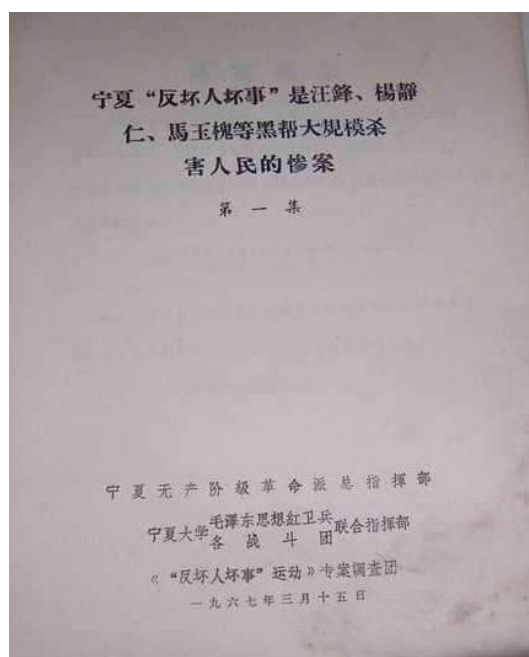
3月7日“联委会”发表声明，要求和军区协商解决问题，遭到军方拒绝，声称是“联委会”的阴谋，并提出请罪、交出幕后人等五项条件。此后在军区支持和组织下，原保守派掀起宣传攻势和组织游行，对“联委会”的打压升级。一些地方出现揪“右派分子”、“请罪”等活动。

此时正是全国性的“二月镇反”时期，但宁夏军区对实施夺权的“联委会”只是施加压力，并未完全取缔，而且领导阶层内部意见也不一致。在“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运动”中受到迫害的一些高中级干部成立的“倒海翻江战斗团”支持“联

¹ 《当代宁夏日史（1966.5-1976.10）》，黄河传媒出版集团、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57页。

委会”。被军区指责为“联委会”后台的甘春雷也向中央提出申诉。在银川，两大派分别频繁召开大会和组织游行，但未发生剧烈冲突。“联委会”处于受压状态，几位当权派已由军区方面控制，只能缺席批判。可是由于受压，一般群众反而倾向“联委会”。

3月14日，宁夏军区及自治区公安厅查封了宁夏大学“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筹办的“银川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展览”。这个展览的相当多内容针对文革前开展的“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和“反对坏人坏事”两个运动予以揭露和



批判。为抗议封闭这一展览，5月2日宁夏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联合指挥部”在公安厅门前举行静坐示威，持续55天之久。（上图：当年宁夏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各战斗团联合指挥部批判“反坏人坏事运动”的宣传材料。）

3月20日银川市公安局军管会以组织不纯为理由，宣布“联络站”系统的银川市中医院“革命造反联络站”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24日，又宣布取缔新城农场的“银川市工矿企业捍卫毛泽东思想联络站第六兵团”。这些被取缔组织的人员随即上京告状。

3月10日，反对“一·二七夺权”的群众组织成立“银川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处”，简称“大联筹”或“筹备处”，后发展为全自治区的组织。3月18日，支持“一·二七夺权”的35个组织，主要是“联委会”的成员，成立“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简称“总指挥部”或“指挥部”。全自治区对立的两大派组织正式形成。

继1967年3月批判“二月逆流”以后，4月初全国形势再次逆转。4月1日中央发出《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提出不要把群众组织任意打成反革命。4月6日“总指挥部”召开庆祝这个文件发布的大会。他们进而采取攻势。此时，

中央对青海的“赵永夫事件”已做出结论。“总指挥部”在宁夏街头贴出“打倒宁夏的赵永夫”、“打倒朱声达”等标语，开始把矛头直接指向宁夏军区司令员朱声达。

5月30日，在军区支持下，两个中学生组织“红卫兵”和“西北野战军”砸了新华社宁夏分社，抢了许多拟发给中央的内参文稿。6月6日，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给宁夏军区，指出这一事件是“严重的政治事件”，要求严肃处理。之后，宁夏分社就这次事件发表《严正声明》。但宁夏军区迟迟未予处理，司令员朱声达和副政委江波到北京要向中央讨个说法。

此外，6月底《宁夏日报》印刷厂的“工人纵队”在印刷《毛泽东选集》时在扉页上印了“打倒联委会”、“一·二七大方向正确狗屁”等标语，引起一场冲突。中央特地为此于7月18日发了222号文件指出是严重的政治错误，绝对不能容许。而宁夏军区仍采取包庇态度，认为是“一般的缺点”，标语可以裁掉，置之不理。¹

1967年6、7月间银川气氛很紧张，两派都拉开了武斗的架势。“总指挥部”作了布置，每天晚上要安排值班，相互以电话联络也要对答口令。7月13日，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的通知》，点名批评了宁夏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严重错误。军区不但不采取措施改正错误，反而以“我们没有挑动农民进城”进行抵制，致使农民进城围斗革命造反派的事件越来越严重。

三派四大组织的形成

宁夏从夺权到内战这段时期，政治局势激荡，各派社会势力登场，群众组织分化组合，不同思想激烈交锋，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首先是两大派之外，还出现了一些中间派别，形成三大派四大组织阵容。

宁夏“一·二七夺权”从一开始内部就有分歧。夺权后，一些分歧公开化了。除去原来的保守派反对夺权外，不少造反派也反对。“联委会”的一些成员退出另组队伍。中学生很早就成立了“红卫兵”、“西北野战军”等反对夺权的组织。这两个组织后来带头砸了新华社银川分社，而且积极在宁夏“抓叛徒”。后来“西北野战军”与保守派合流，成为“筹备处”的核心力量。在宁夏大学成立了反对夺权的“北京公社”、“从头越兵团”等组织。“从头越”后来与其他组织组成“宁夏大中专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红总司”），后与“红卫兵”等组织组成“宁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宁总司”），成为宁夏四大派之一。

另一主要由中学生组成的组织称“银川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第三司令部”

¹ 《当代宁夏日史（1966.5-1976.10）》，黄河传媒出版集团、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58-64页。

（“银三司”），后来于1967年7月6日扩展为“宁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第三司令部”（“宁三司”）。他们拥护在“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运动中被整的交通局局长丁毅民。“宁总司”和“宁三司”既反对“一·二七夺权”也不支持“筹备处”，持比较中间的立场，但反对武斗，也基本没参加武斗，但是也受到宁夏军区的压制、分化和瓦解。“宁三司”也曾于8月21日抢夺过独立师的武器。“宁总司”则于10月1日和“筹备处”一起开会庆祝国庆。

这两个号称“中立”的组织人数较少，影响较弱，所持立场两边不讨好，在中央也不受到重视。在中央开会时因为没参加武斗，与会代表人数也少。康生不止一次说没有第三条道路，不存在中间派。“宁总司”则力图显示自己的存在感，比较倾向“筹备处”，说宁夏有四大派，而不是三大派。

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一些年轻人企图超越派别斗争，探讨隐藏在这缤纷杂乱的社会动乱背后的根源。这种现象出现在宁夏、甘肃、贵州这样经济不发达区域，是文革中的一朵奇葩。在一个正常发展的社会中这本是知识界的任务，在这些地方却由一些名不见经传的边缘人物来承担。

例如银川氮肥厂的一位在“社教”中被整的技术员高永海组织了一个“巴黎公社复兴会”。他的出发点是看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在1966年12月11日的一次谈话中说：“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究竟有什么意义？就是发动亿万群众来监督党和国家领导人，监督我们党和国家机关，就是利用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形式对党和国家机关领导人进行批评监督。这个意义是十分巨大的，对防止无产阶级专政蜕化为资产阶级专政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保证。”要“造成一种风气，群众可以批评党政机关及其领导人”，使“宪法规定的民主和自由权利，真正成为实际的东西”。高永海理解，不仅要形成一种风气而且要形成一种制度，能保证宪法有效实行。

而他思考的主要问题是中国的民主制该是个什么样子，社会主义的民主制该是个什么样子。但是他在马列著作里找不到答案。于是，“我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制上，寄托在党内出现力量均衡的两派上。”而在一个组织里如何实现民主，如何保证反对意见不致被压制呢？于是他想在现实各派之中找一些有头脑的人组成一个秘密组织，旨在控制厂内局势，保证各派势力均衡发展。这个组织组成了，称为“巴黎公社复兴会”，但只有造反派和中间派参加，在保守派中找不到合适的人。¹这个组织在作厂内两派工作、制止武斗上起了一些作用。

一名中央文革记者参加了“联委会”的内部会议，也见识过这种类型的人。在“联委会”的一次内部会议上，两种观点激烈争辩。一位称为“调查组”的青年学生以旁观者的身份发言。这个“调查组”是银川的一个小团体，由几名大中

¹ 高永海《跳进黄河》，天涯论坛，2014。

学生组成，专门以调查研究文化大革命运动为宗旨，并不介入当地运动也不参加任何一派，只是总结经验教训。会上发现，有对方人员混入这个会议，多数人要将其赶出去。也有人说何必呢，要他听听有什么不好？¹这些人主张宽容，一般反对极端做法和暴力行为，希望各群众组织有序竞争。

实际上，“宁三司”就类似这样的组织，但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并非真正的中立。他们支持在“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运动中受打击的交通局长丁毅民，说明他们对文革前的“双反”持批判态度。在这个组织里孕育了后来遭受打击而毁灭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这样的团体也不是偶然的現象。而且，“宁三司”和“宁总司”在以后的青铜峡事件中都能仗义执言，难能可贵。

但是这些理想主义者没有找到适合实践他们主张的土壤，也不为当政者欣赏。宁夏全境很快陷入一片血雨腥风之中。

三、武斗事件

宁夏版图南北狭长。武斗事件大致从北向南发展，首先在银川北部的石嘴山市发生大规模武斗。6月19日“总指挥部”所属五四厂（即石嘴山钢铁厂）“红一二”、矿务局“指挥部”占领了市人委大楼，械斗中死2人，伤多人，“总指挥部”占了上风。7月16日双方又在石嘴山郊区武斗。此后石嘴山成了“总指挥部”的根据地，而“筹备处”的人员纷纷到外地躲避，准备东山再起。

银川西塔事件

1967年6月以后，银川文革进入大规模武斗阶段。两派各自建立武斗专业队伍，自制武器或抢劫枪支弹药，建立据点，实行武装割据。

6月19日。银川毛纺厂两派武斗。6月26日“总指挥部”30余人冲进银川北塔，殴打“红卫兵”、“西北野战军”人员，制造“北塔事件”。6月30日，两派在银川皮革厂武斗。

7月武斗升级，都在策划消灭对方武斗据点。7月31日下午，银川“总指挥部”开会，决定先拿“筹备处”在西塔的据点开刀，继而扫荡全部对方据点。他们首先派出40辆汽车到石嘴山去接同派武装人员来助阵。夜12时，“指挥部”武装部队到达西塔，先行包围，并用汽车撞倒围墙，冲入院内。在双方交火中，由于“筹备处”武器精良、人员众多，多次打退对方进攻，取得大胜，还俘虏了对方30多人。“总指挥部”方只得暂时撤退。

¹ 李近川《赴西北调查琐记》，肖健卿、李近川主编《飞鸣镝——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见闻录》，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1。

8月1日上午，石嘴山援助队伍1200多人到达。下午3时，“总指挥部”总共2000余人再次对西塔发动进攻。“筹备处”方寡不敌众，“总指挥部”大获全胜，打死对方5人，打伤多人，抓了300多俘虏。¹

这次事件后，“筹备处”在银川的据点纷纷被扫除，在银川已无立足之地。“总指挥部”控制了银川。银川“筹备处”的头头纷纷向银北的贺兰县、银南的永宁县、吴忠县转移。

永宁阻击战

1967年6月8日，银川以南的永宁县人武部组织大批农民围攻占领县广播站的“总指挥部”下属农校群众组织。事后永宁“劳大红旗”和“银三司”等组织在军区门口静坐绝食抗议，20日撤离。但后来“筹备处”在银川卫戍区副司令员、永宁武装部部长的纵容下，于8月6日哄抢了武装部216支步枪、数千发子弹，开始用枪支武装起来，控制了整个永宁城，并开启了现代化武器作战时期，造成更大伤亡。

在银川取得胜利后，为拔掉永宁这颗钉子，1967年8月5日银川“总指挥部”由杨长春率领2000余人乘97辆汽车南下，浩浩荡荡，企图一举踏破永宁城。8月8日他们初战得利，轻易拿下了城北的望远桥，遂丧失警惕，冒险南进。而“筹备处”却在前面的大观桥设置路障，并有重兵把守，待“总指挥部”大队人马到来时，步枪、轻重机关枪齐鸣，在弹雨之下，“总指挥部”人马纷纷倒下，队伍瞬时混乱不堪，死伤惨重，一直退到20里外的望远桥。此役双方共死87人、重伤百余人，“总指挥部”带队的杨长春也负了伤。²

“总指挥部”同时派另一支队伍企图援助吴忠被对立派包围的同一派人员。他们从银川出发不久，就发现有一架安2飞机低空侦察，后来很快在永宁县宁化桥遭到伏击。两辆车冲过去以后，在黄羊滩发现道路被截断，遭到“筹备处”几百武装人员机枪扫射，损失严重退回。结果“总指挥部”被打死24人、重伤66人。³

此役震惊了“总指挥部”，纷纷向北京告急，并直接攻击银川卫戍区，卫戍区司令员成为众矢之的。“总指挥部”出动人员多次抢劫人武部和独立师军械库的军火，也用现代化武器武装起来。

吴忠“八一三”大武斗

¹ 郭振伦《宁夏银川市“八一”攻打西塔事件》，余习广博客，2007。

² 《当代宁夏日史（1966.5-1976.10）》，黄河传媒出版集团、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67页。

³ 高永海《跳进黄河》，天涯社区，2014。

中宁北部青铜峡与吴忠的形势日趋紧张。“筹备处”控制了广大乡村，动员了上万武装的民兵，不断地进攻附近各城镇，将“总指挥部”压缩到河西、吴忠若干据点，迫使“总指挥部”不得不抢占一些制高点以据守阵地。吴忠的“总指挥部”只能固守在东方红剧院，吴忠材机厂等处。而青铜峡河东的“总指挥部”已全部退守至青山机器厂。

吴忠的“总指挥部”的根据地原在南郊的巴浪湖农场。他们从7月初开始就积极准备进攻吴忠县城。为此聘请在“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运动中挨整、文革中又遭受迫害而今返乡赋闲的原宁夏军区副司令员马思义为总指挥，负责训练武斗人员。他们于7月24日出动400余人携带冷兵器攻下了吴忠城，以吴忠仪表厂为中心建立了九个主要武斗据点，并将队伍发展到2000人。

撤出吴忠的“筹备处”并不甘心失败，在灵武县同派支援下，集中力量准备反攻。8月9日他们开始集结队伍，以农村基干民兵为主力，发放武器。经数日准备后，“筹备处”出动几千人的队伍开进吴忠，包围了“总指挥部”几个主要据点。吴忠的“总指挥部”数千余人被围困在仪表厂、材机厂、配件厂三个据点长达16昼夜，于8月5日被迫放弃其余两座大楼，孤守仪表厂大楼。

此时，中央已令62师到宁夏支左。得到消息，“筹备处”派出两汽车人员阻止62师到达吴忠，另一方面加紧进攻“总指挥部”的据点。8月13日“筹备处”对仪表厂进行最后攻击，炸开围墙后经两小时激战，攻下仪表厂主楼。“总指挥部”全军覆没。马思义在主楼二楼被枪杀。此役双方死亡11人，受伤百余人。¹

马思义是回族，1946年率200余回族战士从马鸿逵部队中起义，南下陕北，成为隶属三边独立团的回民支队的支队长，在解放战争中屡立战功。解放后，他随原独立团团团长牛化东回到宁夏，曾任宁夏军区副司令员。在饥荒年代因不满西海固人民困苦，饿殍满野而口出怨言，反右倾时被打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而被剥夺了军权，削职为民。文化大革命中，为了替自己鸣冤，较早支持造反派而被军区公布档案予以迫害。后来他参加“总指挥部”组织并指挥武斗。

1967年10月21日康生在接见宁夏代表时说以前不知道文革前的“双反”运动。谈到马思义被杀时说“中央当时可能是彭真处理这一案件的。这样一个事情，在文化大革命中应该给他们平反。不但不平反，相反还把马思义同志杀掉了，这实在是痛心！”

62师支左

¹ 郭振伦、余习广《宁夏吴忠“八一三”大武斗》，余习广博客，2007。

宁夏武斗震动中央。1967年8月12日，周恩来、康生、关锋等领导人在北京接见了张怀礼等宁夏军区领导人。

中央认为宁夏军区在“三支两军”中犯有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决定派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康健民率21军62师和炮兵15师8团接替宁夏军区负责宁夏的支左任务，并成立以康健民为组长、张怀礼、徐洪学（62师副师长）为副组长的宁夏支左领导小组。根据中央指示，62师立即表态支持宁夏“总指挥部”。宁夏军区18日表态支持“总指挥部”，21日发表《公告》，正式表示肯定“一·二七夺权”的大方向，撤销对“筹备处”的支持。

8月16日康生、关锋等在京接见朱声达、江波、张怀礼等宁夏军区代表以及康健民，批评宁夏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19日康生等在京接见宁夏军区和“总指挥部”代表。

62师于8月12日接受任务后，原驻甘肃平凉的师部率185团进驻银川，原驻固原的186团进驻吴忠、灵武、青铜峡地区，原驻平凉的炮兵242团进驻平罗、石嘴山地区。¹

当中央决定62师支左时，吴忠两派鏖战正急，而且战火蔓延至临近吴忠的青铜峡。当时“总指挥部”派扼守青铜峡河东（黄河以东）的唯一据点青山机械厂。“筹备处”企图南下攻中宁，但先要拔掉这颗后方的钉子，8月20日后，青铜峡的“筹备处”聚集几千人围攻青山机械厂，很快将“指挥部”人员困在一座三层楼房内，使之处境岌岌可危。

8月12日62师奉命开赴宁夏各地，18日前指到达银川。原来驻固原的186团在青铜峡受“筹备处”阻挡，其余部分进展顺利。炮15师8团原驻甘肃，于9月11日进驻永宁。

青铜峡事件

在青铜峡受阻的部队被“筹备处”发动农民围住。这些农民睡在公路上还挖坑断路，其头头扬言要炸掉青铜峡水库大坝。部队与他们交涉无效，只得暂停于青山试验机厂等地并于8月25日向上请示。²

请示报告说，部队已被围困数日，水库大坝有被炸危险，若事态蔓延，可能影响西海固回民暴乱。兰州军区接到报告后立即转报中央。次日周恩来、康生、关锋等首长正接见宁夏军区、21军代表。当日晚周恩来给冼恒汉打来电话，要军区拟一个处理意见。军区党委开会后，提出三点解决方案：一、为了确保大坝安全，在群众冲击大坝时，要大力宣传，耐心教育群众，讲明破坏大坝的严重性，

¹ 余汝信《“青铜峡事件”述略——冼恒汉回忆录补正之一》，华程网。

² 同上。

说服群众自动撤离大坝；二、若劝阻无效，仍有群众进行爆炸大坝的行动时，部队可以对空鸣枪警告；三、若不听鸣枪警告，继续进行爆破活动，并在部队阻止当中有人开枪向部队射击时，指战员生命受到威胁，部队可以还击，但要尽力少伤群众。

8月28日凌晨，康生给冼恒汉打来电话说：“总理委托我叫我给你打个电话，你们关于青铜峡的处理意见报告，中央收到了，毛主席也看了，政治局也研究了，中央同意你们的意见。”冼接电话后立即召开党委常委会进行传达，并且立即把中央的决定和军区的意见告诉了宁夏支左领导小组康健民、徐洪学。支左领导小组立即命令部队执行中央决定。据信应有中央军委的正式命令。后来部队声称，他们先是朝空中开枪，但是对方不撤退还开枪打死部队战士二人。于是部队朝群众开枪，当场打死104人、伤133人，还扣留860人，造成震惊全国的大惨案。8月30日中央作出关于青铜峡事件性质问题的指示，说青铜峡事件是反革命叛乱，并点了朱声达的名。

指示主要精神如下：一、宁夏“筹备处”一小撮坏头头，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杨马黑帮代理人、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朱声达之流的黑指示，拒绝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和党的方针政策，抗拒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污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二、疯狂镇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把吴忠革命造反派（吴忠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压垮后，又从永宁、灵武、小坝等地调兵遣将，动用武力，大规模地围攻、镇压青铜峡的革命左派组织（青铜峡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等，惨杀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战士和革命人民，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三、破坏铁路，切断交通，使北京至兰州的火车，银川至固原的汽车，长期不能通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四、矛头指向解放军，阻拦解放军的军事行动，围攻解放军驻地，抢夺解放军武器，绑架解放军，明目张胆地向解放军开枪，打伤、打死解放军干部战士。五、煽动农民不交公粮，抢劫国家资产和人民群众私人财物。¹9月14日“筹备处”赴京代表给康生写信辩解，被康生在9月20日讲话中批驳。

这一惨案当然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所谓扬言要炸大坝，只不过是几个头头的狂言。大坝不是那么容易炸的，“筹备处”方面也没有任何要炸的具体准备。和新疆、青海等地所发生的部队开枪杀人事件不同，这一事件不是屠杀造反派而是屠杀保守派。事后“筹备处”当然竭力谴责这次屠杀，说是康生的主使。“宁三司”和“宁总司”也说是回民的镇压。康生等在1967年9月14日、20日、24日多次接见宁夏各方代表。康生在9月20日接见宁夏代表时说：“宁夏宁总

¹ 《中共中央关于青铜峡事件的性质的指示》，中国文革研究网，2007。

司、宁三司要特别注意。他们现在，还企图挑拨民族关系，说青铜峡镇压少数民族。”

平罗“八二九”武斗和银川掌政桥之战

石嘴山武斗后，“筹备处”人员被赶出石嘴山。他们和平罗县同派人员聚集在平罗县渠口公社等地，以图再起。但是62师进驻宁夏后，他们感到在此地难以立足，计划撤到银南一带。

“筹备处”200余人于8月28日晚12时动身，但是由于消息走漏，在平罗附近遭到“总指挥部”伏击，司机被打死。天亮以后，“筹备处”援军赶到予以反击。但是由于62师支持“总指挥部”并且直接参加战斗，“筹备处”遭到失败。此役双方死亡12人，伤残数十人。¹

虽然62师进驻后，“总指挥部”占压倒优势，但“筹备处”一方仍占据广大农村甚至控制银川附近地区。1967年8月30日凌晨，“总指挥部”百余人突袭银川掌政桥的“筹备处”基地。但“筹备处”一方早有准备，立即进入阵地组织反击。由于火力强大，“总指挥部”进攻不利，坚持到上午8时，“筹备处”援军赶到。“总指挥部”遭到前后夹攻，不得已朝银川方向撤退。上午9时许，银川“总指挥部”得知这一消息，立即组织22个单位1500多武斗人员携带枪炮乘数十辆汽车前去救援。救援途中遭到对方阻击，派部分人抵抗，主力部队仍前进将“筹备处”围困于掌政桥。此时永宁县的“筹备处”也派遣500人的武斗队伍前往救援。双方开辟新的战场，战斗异常激烈。后经62师调解，双方脱离接触。此役双方死亡15人，伤数百人。²

四、革委会的成立

“大联合”的实现和革委会的成立

62师进驻支左以后，大局已定，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不再发生。宁夏军区将“总指挥部”定性为“革命左派组织”，10月10日发表《通令》，要求支持“总指挥部”。“筹备处”被视为保守组织受到压制，但是仍在组织各种活动。一些成员在作自我批评后成立了一个“革造”组织，后来作为“筹备处”方的代表参与各派的谈判。中央首长多次接见宁夏代表促进联合。1967年11月25日，“筹备处（革造）”、“宁总司”、“总指挥部”、“宁三司”在京签署《宁夏赴京代表团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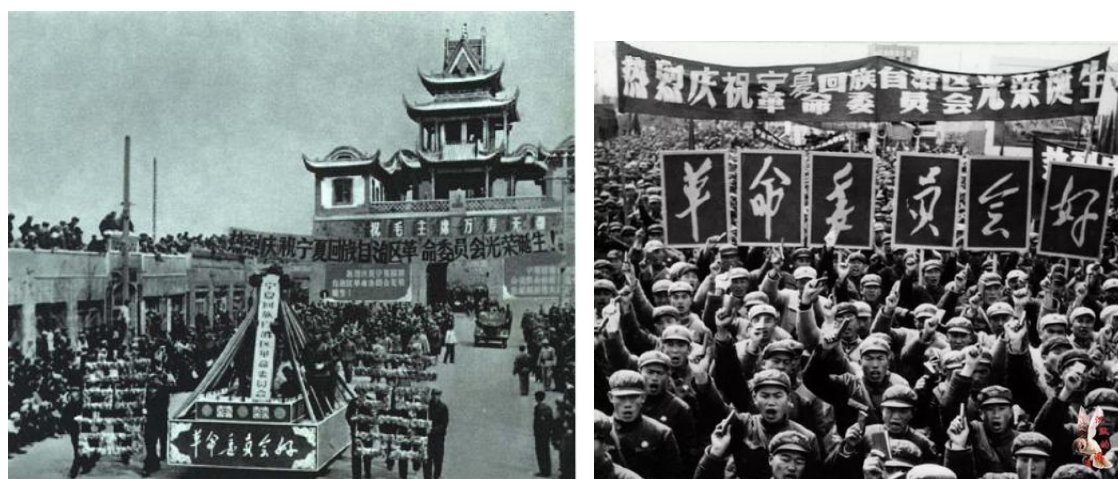
¹ 郭振伦《宁夏平罗“八二九”武斗》，余习广博客，2007。

² 余习广《宁夏银川八三〇“掌政桥之战”》，余习广博客，2007。

于停止互相攻击、收缴武器、制止武斗的协议》。12月9日，四方代表又在北京签署《关于实现宁夏革命大联合的协议》。

1967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407号文件《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指出宁夏军区党委在文革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决定成立以康健民为组长，张怀礼、徐洪学、王志强为副组长的宁夏革委会筹备小组。29日周恩来、康生、江青等中央首长接见了宁夏军区及群众组织代表宣讲中央的决定。

1968年1月，银川市的“总指挥部”、“宁总司”、“宁三司”三派实现联合，成立“银川市革命大联合委员会”。2月以后，一些地区的革委会相继成立。2月20日银川市革委会成立。全自治区的工代会也在2月成立。3月大专院校的“红代会”成立。4月10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委会成立。革委会主任康健民、副主任张怀礼、徐洪学、王志强、安建国。1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不到长城非好汉——热烈欢呼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其中点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杨静仁、马玉槐的名。



甘春雷在宁夏始终未被结合。他于1969年10月调任原籍河北省任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1972年6月20日宁夏自治区革委会始做出关于甘春雷问题的审查报告，文革后撤销，予以平反。

朱声达于1968年1月到北京进学习班检查错误，1969年10月下放到陕西省劳动，1973年10月，降职为甘肃军区副司令员。他在长征期间曾任贺龙的警卫员，因此在文革中一直不被信任，但是也没有受到正式处分。

1968年9月，原骑兵第二师师长张桂金被任命任宁夏省军区司令员，1970年4月任政委，7月任命62师师长姜玉安为军区司令员。

“布派”和“米派”之争

1968年3月24日，在北京发生“杨余傅事件”，提出反对右倾、反对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口号。在《人民日报》庆祝宁夏革委会成立的社论中也说到：“当前，要特别警惕右倾保守思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反对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反对两面派，打退阶级敌人的‘翻案’黑风，粉碎他们的复辟阴谋，发展大好形势，把革命进行到底。”4月28日《宁夏日报》发表社论《痛击翻案妖风》。于是在宁夏掀起一场“反右”运动。这一运动和当权的造反派内部分歧交叉在一起，造成复杂的局面。

新的自治区领导和宁夏军区支持以“总指挥部”为代表的造反派，但是在革委会代表名额和结合干部问题上有分歧。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前夕的1968年3月21日，自治区“工代会”、“红代会”、“总指挥部”向宁夏军区和中央报告，说筹筹小组“走中间路线”，造反派受打压，“联委会打天下，‘倒海翻江’坐天下”。其中的“倒海翻江”主要是由文革前的“双反”运动中被迫害的领导干部组成，而“总指挥部”的主流派拥护当初参加“一·二七夺权”的甘春雷，新的自治区领导则比较支持在“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运动中受迫害的王志强，以与原来的自治区领导班子拉开距离。

这些矛盾导致造反派内部的分歧。在“总指挥部”内部，多数派采取强势立场，后来称他们为“布尔什维克”派，简称“布派”，而与其对立的少数派称“小米加步枪”派，简称“米派”。“米派”虽然处于弱势，但受到军区暗中支持，两派斗争激烈。1968年2月23日，“总指挥部”成立“肃清叛特反资联络总部”，简称“联络总部”。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暴力行动，最初是“布派”用来对付“筹备处”的，后来用来对付“米派”，正式纳入“总指挥部”组织组。

4月20日自治区“工代会”、“红代会”和“总指挥部”发出《关于对待大联合筹备处一小撮坏头头问题的通知》，要求惩办吴忠武斗事件凶手。4月23日，这几个组织召开“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誓死保卫红色政权大会”，会上批判了“反革命两面派”丁毅民。一些地区和部门发生冲击革委会、夺权、武斗等事件。5月15日“总指挥部”下属几个组织召开“彻底批判王志强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誓师大会”，并未受到自治区革委会的支持。

很快两派的“文斗”发展成武斗。“总指挥部”的“布派”以“反四右”为旗帜，与“米派”频频发生冲突。5月2日固阳“指挥部”与“米派”中学生发生冲突，死1人，伤4人。5月7日固原林建三师两派再次武斗，死3人，重伤30多人。5月24日固原一中的学生抢劫劳改农场武器，与“总指挥部”枪战，中学生被打死1名。

同时，银川“米派”两千多人攻击“布派”的“八八交通纵队”。5月23

日“八八”进攻“米派”并冲击部队和支左办公室，称为“五二三事件”。

在这种情况下，宁夏军区决定支持“米派”搞垮“布派”。6月1日在纪念“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两周年大会上，康健民在谈话中指出在前两个月的反右斗争中存在着一股极左风干扰运动大方向。在军区支持下，6月9日，“米派”的中建部“八〇一井冈山五分团”、银川机修厂“指挥部”、银川橡胶厂“造反总部”、一〇九厂“大联合委员会”、银川棉纺厂“指挥部”、党校“赤遍环球”等六组织发表《对我区形势的联合声明》，指责“布派”是“中国赫鲁晓夫的第二套班子”，将“米派”和“布派”的分歧与斗争公开化。当天晚上，自治区领导康健民、徐洪学、安建国等接见了发表“六九声明”的群众组织代表。¹布派则于6月13日发表声明，称目前运动的任务仍是“反右”，“六九声明分裂革命阵营，颠覆红色政权”。

此后，自治区领导人多次指出要反对“形左实右”的反动思潮。他们又接过“杨余傅事件”后中央提出的“反多中心论”作为理论武器来对抗“反右”思潮。

“布派”掌控的“总指挥部”在1968年4至7月得势，但是随后发生了一系列事情：“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军工宣队和农宣队进驻上层建筑、大中学校学生下放劳动、群众组织解散、中央制止武斗的“七三”和“七二四”布告颁布。军区利用这些运动有效地削减了“总指挥部”的势力，清除了各级革委会中的“布派”代表，并且集中打击了“肃清叛特反资联络总部”这个组织，称之为“颠覆红色政权的黑指挥部”。9月13日在银川召开自治区革委会第二次扩大会议，集中批判了“反动的多中心论”，批判了“联合总部”“炮打三红”、分裂革命队伍的“滔天罪行”。在会上，所有“布派”领导被批斗然后打倒，并且涉及一批干部。9月15日在银川成立揭批“联络总部”的办公室并召开揭批大会。“联络总部”及其各地分部皆被摧毁。10月16日在银川召开镇压反革命分子公判大会。区革委会常委陈养山在会上讲话，号召向“联络总部”发起总攻。

1968年9月，宁夏军区对固原的农建13师和林建3师实行军管。9月25日开始，固原专区举办“对敌斗争学习班”，对“炮打三红”骨干分子30人、“叛、特、反、资”分子40人搞逼供，整死2人。1969年春，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总指挥部”系统的“林总指”骨干被“群众专政”，指挥武斗的头头3人在公判大会上被判处死刑。²1970年5月18日，永宁县召开宣判大会，宣判1967年10月21日毒打县委副书记李耀泰致死一案，判处永宁“总指挥部”的“红色农民造反团”头目杨兆华死刑并立即执行，判处张自安无期徒刑，其他人员有期徒刑。³

¹ 《当代宁夏日史（1966.5-1976.10）》，黄河出版传媒公司、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90页。

² 驼铃 xiaf 的博客《峥嵘岁月-文革动乱》，2009。

³ 《银川大事记》，银川档案方志网。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联络总部”人员和传统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并列。例如固原专区西吉县到1968年11月底共挖出阶级敌人1358人，包括“叛、特、反、资”570人、“联络总部黑干将”181人、“国民党残渣余孽”607人。另外还有“地、富、反、坏、右”分子723人，都由“群众专政指挥部”实行“群专”。¹自1967年8月以来，宁夏的文革棋局再次翻盘。

当代宁夏历史上短暂的春秋战国时代结束了，接替的是极其严酷的专制统治。

五、从“清队”到“一打三反”运动

公判大会

1968年7月，自治区革委会和驻军“支左小组”开始部署“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当月即制造了一个以赵延年（原自治区委农村办公室副主任）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冤案。在“清队”运动中全自治区共审查2.9万人，推行逼供信，造成一批干部群众致伤、致残、致死。

1968年7月30日，自治区革委会召开公判大会，判处吴忠武斗中打死马思义者和“青铜峡事件”中的“主犯”死刑缓期执行和有期徒刑。

宁夏的“一打三反”运动开展很早。1970年2月13日，自治区革委会发出《关于贯彻中发〔1970〕3、5、6号文件的通知》。实际上在2月10日左右，固原、石嘴山等地即布置开展这一运动。随即雷厉风行，很快举行一系列公判大会，一大批无辜者成为冤魂。

2月14日，银川市、固原专区、中卫县分别举行公判大会，判处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死刑和有期徒刑。2月17日，石嘴山市召开公判大会，判处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及刑事犯罪分子。2月23日，银川电业局革委会宣布破获“反共救国军案”，29名案犯被群众专政。文革后被平反，确定是一桩假案。

3月12日，自治区革委会、银川市革委会召开6万人大会，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3月19日，自治区、银川市两级公安机关召开宣判大会，判处25名“犯罪分子”。其中包括《宁夏日报》编辑张堪宝，他在群众专政时期精神失常后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同日吴忠县以“国民党中统案”判处4人死刑、1人死缓、5人有期徒刑。同时以“中华民族自由民主党”反革命罪判处3人死刑。事后判断皆为假案。

¹ 《当代宁夏日史》（1966.5-1976.10），黄河出版传媒公司、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105页。

4月29日，固原地区对“周家河湾反革命轮奸案”判处4人死刑。文革后予以平反昭雪。同日海原县宣判“以杨如德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阴谋暴乱集团案”中7人死刑，其他29人有期徒刑。6月30日，西吉县对“马跃清为首的反革命预谋叛乱案”宣判，判处马跃清死刑，另2人死缓、6人无期徒刑、28人有期徒刑。

7月8日，吴忠县以“反革命罪”判处周广田、翁星云死刑，赵晓初先判死缓后又改为死刑。¹

在银川召开的这种当场处决的公审大会的场面，著名作家张贤亮见识过一回。张贤亮是1957年的右派分子，下放宁夏农场劳动，1965年“四清”期间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判处劳改三年。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期间，他正在属于农建13师的南梁农场管制劳动。他描述的这次大会又称为“一打三反动员大会”，可能就是1970年2月14日的那次大会，宣判了上百人，处决了十来个人。他被当作“修正主义分子”挂牌押送现场“受教育”。在他的笔下，当时的群众早已丧失了运动初期的那种热情，变得神情淡漠麻木，把参加这种活动当作一种群众性的狂欢。²

三冤案

“三冤案”的提法来自《当代宁夏史通鉴》³。这三冤案是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判处的田涛、朱守忠、余渭国三起典型案件。

田涛早年参加革命，曾任西北局农村工作部处长，后下放贺兰县任公社书记。文革开始后，他竭力反对煽动造反夺权的路线，声称中央《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有问题，应该修改，认为其中对永宁事件、吴忠事件和青铜峡事件定性不对。他曾6次上北京上访，5次被遣送回来遭到批斗。1970年1月和2月，他在当地贴大字报揭发康健民镇压群众，旋被捕。1970年3月19日，贺兰县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他在狱中仍上书中央反映情况，遭到毒打和虐待，死于狱中。1974年5月，自治区最高法院曾撤销原判，宣告其无罪，但仍称其犯有政治错误。文革后彻底平反。

朱守忠原是一位上海教师，1957年反右中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后来他下放宁夏支教，在中卫中学工作，在“反对坏人坏事”运动中被当作坏人劳动改造，在“社教”运动中又被开除公职，分配到文教农场劳动，

¹ 《当代宁夏日史》（1966.5-1976.10），黄河出版传媒公司、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151-166页。

² 张贤亮《美丽》，《著名作家回忆文革时期的经历：亲历历史》，天益社区，原载《收获》杂志《亲历历史》专栏。

³ 《当代宁夏史通鉴》，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116-118页。

文革初期又遭到批斗，被送到盐池县农村，1967年回到文教农场。1968年他回到上海，发现家庭成员处境悲惨，以前熟识的朋友也大多被审查，于是放弃了申诉活动，开始深入考虑国家前途。回到宁夏后，他在一些公开场合为刘少奇鸣不平，批判林彪，虽遭批斗而不改口。1970年2月10日银川市革委会保卫部以“现行反革命抗改罪”判处其死刑。文革后被平反，宣告无罪，且被国家民政部批准为革命烈士。¹

余渭国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在宁夏地质局工作。他主要是反对林彪，于1970年4月1日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4月29日判处死刑，文革后彻底平反。

“共产主义自修大学”案

1970年8月21日，银川市举行10万人的宣判大会。会上革委会保卫部宣判“共产主义自修大学现行反革命集团案”，将涉案的13名青年分别判处徒刑和管制。其中，主犯吴述森、骨干鲁志立、吴述樟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判处陈通明无期徒刑，张绍臣、张维智、徐兆平有期徒刑，其余6人被拘捕关押。

文革开始时，吴述樟是银川二中学生，实际是这个团体的组织者。他的兄长吴述森是宁夏大学毕业生，鲁志立是北京农业大学毕业生。吴述樟和他后来的一些同案是“宁三司”银川二中分部的成员。这个分部实际是后来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的前身。²但是他们从1968年就逐渐脱离运动，开始思考政治运动中出现的一些他们认为不应发生的现象。他们只能从仅能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理论出发，私下进行讨论。1968年底以后他们或分配工作或插队落户，分散到六个地区，但依然保持通信关系，交流思想，探讨问题。吴述樟分配在西吉县玉桥公社。1969年国庆前夕，他们创办了一个称为《学刊》的油印小报，刊登每人写的理论文章、读书笔记和调查报告。11月13日，吴氏兄弟和鲁志立、陈通明、张维智聚会在一起，决定成立一个“学习小组”性质的组织，名为“共产主义自修大学”。此后，他们阅读了大量马列经典著作和一些历史书籍，《学刊》共出两期，刊登过6篇文章和3篇调查报告。

其中的内容大部分是对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探讨，也有不少针对现实问题，如对林彪《再版前言》的批判。而在《迎接七十年代第一个春天》文中，吴述森说：“通过五十多年的实践以后，我们今天需要强调说，承认阶级斗争，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并且同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从有阶级到无阶级的过渡，是消灭阶级的手段，而不是制造新阶级，实行权力、财产再分配的变革，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鲁志立的《什么是法西斯主义》则有力地讨伐了当时的个人迷信、领袖

¹ 《雪化松愈直》，《春风化雨集（下册）》，群众出版社，1981。

² laocai 博客《震惊全国的冤案“共产主义自修大学”与吴述樟》，2010。

至上的神话。他批判道：“禁止一切为世界公认的民主权利，以至人民的思想和言论自由，残酷镇压一切反对或仅仅不同意暴力统治的人民，甚至采用公开的暴力手段。”从而喊出时代的最强音：“打倒法西斯！”

1970年春节后，这个组织及其活动被揭发。3月12日吴述樟在西吉被捕，很快鲁志立在北京被抓获，吴述森、陈通明、张维智等分别在宁夏各地被押解归案。另一些则在本地监押。

当时正逢“一打三反”，他们组织团体本身就触犯了当时的大忌，尽管主调是研究马列主义，而独立思考所产生的宝贵思想更不容于专制制度，从而作为为民主制度呼喊的先行者被送上祭坛，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所加给他们的罪名是“打着研究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号，进行旨在推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反革命组织”，“是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策略、有言论、有行动的现行反革命集团”。

除去当时被害的吴述森、鲁志立、吴述樟以外，还有一位涉案的女学生熊曼宜从监押处逃脱，自杀身亡。¹

文革后的1978年自治区召开大会为此案平反昭雪。9月29日《人民日报》报道了这一消息并配发评论员文章《革命青年的锐气是扼杀不了的》。

六、固原叛乱事件

社会背景

宁夏文革中，类似其他少数民族自治区域，有两条线贯穿文革始终：造反运动和民族问题。两条线不时有所交叉。上述青铜峡事件中，62师的报告中已提到，如果事态蔓延可能影响到西海固地区回民叛乱问题，说明此时在西海固已发生过或正在发生回民叛乱事件。1967年8月16日，康生接见宁夏代表时也谈到：“海原县县长马志宽煽动群众说：发扬过去的老办法，上山打游击。这个问题，要注意。”

西海固是个回民聚集居住地区，自然环境极其恶劣，1972年曾被联合国评为不适合人类居住地区。至于环境如何恶劣，人民生活如何贫困，可以参见公安部副部长施义之1971年实地考察的观感。

他所看到的是：“当地地处黄土高原六盘山区，自然条件极差，常年干旱，缺水少雨。山是光秃秃的，没有树，没有草，生态失衡，粮食亩产量很低。群众生活非常困难，吃的主要是土豆和返销的玉米、薯干等，白面很少。很少吃到盐，

¹ 陈川《追求真理的青年》，《春风化雨集（下册）》，群众出版社，1981。

更没有油。我们工作组的同志与群众同吃同住，一天两餐，吃的是白水煮土豆、荞麦面饼，没有盐没有油，大家反映吃不饱。这里缺柴，烧的是牛粪和有限的麦秆、秫秆，不够烧就用铁丝耙草，连草根耙出来烧掉。这样年复一年恶性循环，黄土上的草越长越少。缺水，有的村庄只有个积少量水的水窖，大家都吃用这小水窖里的水。真是缺粮、缺柴、缺水、缺盐。”

他们一行路遇一位老汉带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女孩身上只披着一张羊皮，没穿衣服。到人家里去看，窑洞里光秃秃的，只有土炕、土墩。有的家庭只有一套衣服，谁出去谁穿，回来蹲在炕上。¹

贫困不仅来源于自然环境恶劣也来源于政策的失误。原来此地产胡麻，胡麻油可以外销。如今只允许种粮食作物，而小麦、荞麦的产量很低，每亩只有几十斤，只能主要靠食土豆为生。

也许是自然条件的严酷和生活的艰难使得人们把精神寄托于宗教。但宗教活动越来越受到限制和打击。由于宗教政策和合作化问题，“解放”以来的17年中发生8次叛乱。这8次叛乱指比较大的事件，小的事件则层出不穷。

“1958年，仅在宁夏回族聚居地区，就平定了所谓‘以清真寺为据点，以阿訇为骨干’的‘反革命预谋叛乱’57起。侦破中以‘点头就算，露头就打’为方针，大搞神秘主义，大搞逼供信；全区逼出所谓参叛人员1万多人，打击处理5000余人。在回族聚居的固原、同心、吴忠等地县及一些回族乡村，还进行了群众性的镇反‘补课’运动。宁夏固原地区有157名回族干部也涉嫌参预‘叛乱’而被遣返回原籍。”在“四清”运动中，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哲合忍那派教主马腾霁被关押。

到了文革前夕和文革中，对民族习惯和宗教信仰进一步限制、糟蹋和亵渎。1964年以来发动三次动员回民养猪运动，使他们感到受到极大的侮辱。同时限制养牛羊，宰杀牲畜时也不允许阿訇念经。文革开始后，许多地方的农村在彻底摧毁“封建”遗迹的口号下，大肆烧文物、拆寺庙、毁拱北、平坟头、砸墓碑，毁坏清真寺，阻止回族群众上寺，禁止回族群众着民族服饰。

1970年7月14日，自治区革委会发出《关于大力发展养猪事业的指示》，鼓励回民养猪。部分回民村和回民被强迫养了猪。固原专区革委会于12月召开养猪工作会议进一步落实这一政策。²

“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更是把群众正常的宗教活动视为‘阶级斗争新动向’，是‘封建迷信复辟’而严厉禁止；回族群众被迫转入地下的宗教活动，又被视为‘反革命串连’；群众不得不在暗中举行的民族宗教节庆活动与必需的集体性宗教仪式活动，则被定为‘反革命阴谋叛乱’，大批回族干部群众被定为现

¹ 施义之《去固原地区平反》，《记忆》41期，2010。

² 《固原市志》，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42页。

行反革命分子。有的纯回族村庄，所谓‘反革命分子’之多，甚至找不出一个‘政治可靠’的人来担任生产队长或会计，只好从汉民村迁入‘干部’来‘掺沙子’。”

¹

2000年10月宁夏人民出版社的《固原回族》一书中记载：“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所谓十年内乱时期，党的民族工作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这个时期，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在破四旧和横扫一切的口号下，海原县在三天时间拆除了67座清真寺和三座拱北，致使固原地区清真寺全部拆除，强迫回民剃胡子、剪辫子、揭盖头，把机关厂矿撤销回民灶，号召回民家家户户养猪。他们把被迫转入地下的宗教活动当作反革命阴谋暴乱，把教民出散的‘乜体’当作筹集反革命活动经费。”多次所谓“叛乱”就是这样发生的。

灰条沟事件

文革中，西海固地区发生多起“反革命叛乱事件”，重大的有西吉县的“301”事件、海原县的“灰条沟事件”和“102”事件、同心县“万人油香会”等事件，制造了一批冤假错案，使广大信教群众蒙受了深重的灾难。

据《回族简史》一书记载：“1968年和197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西吉两县回族群众要求过圣纪节，开放清真寺，进行宗教活动，被确定为两起‘预谋反革命叛乱案’，错误地拘捕、处理了一些人，受牵连的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达数千人。”²其中典型案件就是海原灰条沟事件。

1968年6月19日，海原县革委会命令县武装纠察大队到红羊公社灰条沟抓“坏头头”马生祥阿訇。这一天，灰条沟附近几个村子里二三百人集中在一起，宰了两只羊过“尔麦里”（amal，一种伊斯兰教仪式）。突然，乘几辆汽车而来的持枪荷弹的军警将他们包围，认为他们是反革命叛乱。他们不由分说，架上机关枪，一开始是对空开枪，子弹乱飞。军警下车后在人群里搜查马生祥，找不到以后就要把马生祥的弟弟马生录带走。教民挡住不让带走，这群军警就开枪，当场打死3人，打伤1人，酿成灰条沟血案。当场有支左的解放军高喊：“不能开枪！”却未能阻止。事后海原县革委会对此事未作任何处理，未追究杀人者任何责任，造成极其恶劣的后果。

灰条沟事件之后，马生祥于8月被捕。海原县革委会把教民的宗教活动当作现行反革命阴谋暴乱，把附近村庄的阿訇们当作反革命阴谋暴乱的首犯，大张旗鼓地、无中生有地罗织罪名，捏造黑材料，到处抓人，先后逮捕了十余名阿訇和乡老。给他们罗织的罪名是：“利用封建宗教迷信，猖狂的进行反革命活动，发

¹ 吴东博客《回族14》，2008。

² 转引自 ms10943 的个人空间《文化大革命十年》，2010。

展反革命势力，组成反革命阴谋暴乱集团，拟定反革命行动计划，狂妄叫嚣要坐‘四十年天下’；大搞反革命串连，配合帝、修、反、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更为恶毒的是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敲诈勒索群众财物，打击迫害贫下中农，破坏革命，破坏战备，破坏生产。”固原县阿訇杨如德被指为首犯。他与马生祥阿訇、田成仁阿訇、安克明阿訇等7名“罪犯”在1970年4月29日被枪杀（古历3月24日）。¹

当时的县革委会主任石道儒亲手签字枪杀了几十名阿訇，1974年因车祸死于灰条沟。县革委会召开追悼大会后将其埋葬在烈士陵园，后被回民挖掘，被其亲属送回家乡安葬。²

上述文献还谈到：“71-73年的三年大旱，粮食绝收，人们都饿着肚子，一个‘反革命’的家属更是苦难上加苦难。在生产队受人歧视，受人压迫。”而这样的家庭比比皆是。当时听在宁夏工作的朋友说，很多村都成了“寡妇村”，成年男人很难看到了。

固原问题座谈会

1971年，农林部的杨立功副部长到西海固地区视察，看到那里群众生活困难，发生过多次叛乱，一批批“匪属”产生，使得发展党员、征兵没有对象，也选不出基层干部。听到汇报后周恩来决定让公安部一位副部长去当地摸清叛乱情况，进行平反。于是在11月，公安部副部长施义之带十几名干部出发，经银川到西吉、海原调查，亲眼看到了上述情况，使他们感触颇深。³

施义之回京后向周恩来汇报。周指示对该地区予以物资救济，并派医疗队前往。在汇报对8次叛乱的调查结果时，纪登奎说，不用查档了，宣布全都平反算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72年1月24日到2月12日在京召开固原问题座谈会，由李先念主持，施义之、杨立功和宁夏地方三级有关干部参加。会上讨论了叛乱和群众生活问题，认为主要问题是干部的大汉族主义，违反民族政策，不尊重民族习俗和宗教信仰，混淆两类矛盾，使少数敌人有可乘之机。会议明确对“扩大化”的问题、对逼供信造成的假案必须平反，对错判、错管、错戴、错划的劳动人民必须平反。

在讨论援助西海固地区什么物资时意见有分歧。地方干部希望得到拖拉机、汽车、电磨之类物资，施义之根据实地考察结果，认为应主要援助树苗、草籽，植树造林，恢复生态平衡。

¹ 《洪门的几位大阿訇事迹略记》，苏菲历史，2008。

² 《为了永久的纪念——619灰条沟事件真相》，苏菲论坛，2008。

³ 施义之《去固原地区平反》，《记忆》41期，2010。

会后写报告上报中央。中央于7月2日下发22号文件，通报了调查组和会议的两个报告。但是这个会刚开完，1972年2月29日，固原地区隆德县又发生以糟占林为首的叛乱事件。这些人以林彪的名义起事，串联了临近的陕、甘、宁各县150多人，还有一名革委会委员参与。他们杀死了隆德县保卫处长和一位保卫干事，正在与民兵对峙。武装冲突中，双方各被打死13人。

中央仍派施义之、杨立功处理此事件。他们到达现场后，21军也派一个连前来。3月10日叛乱被镇压下去，领头的也被抓住。3月13日到17日，为总结这次平叛经验和贯彻固原问题座谈会精神，召集固原地区常委扩大会。自治区领导人康健民也来参加。会前传达了李先念等中央领导指示：“不能因为发生这点事情动摇了座谈会精神，影响座谈会精神的贯彻。”1974年4月6日，隆德县召开宣判大会，判处此案主犯糟占林、咸荣华、马虎成死刑，咸得有、马金忠死缓，马俊昌无期徒刑，另有咸义录等7人有期徒刑。¹

经统计，全地区平叛扩大化涉及86个公社、516个大队、1756个生产队、17198人。地区派出宣传队进行调查，归纳出平反名单上报批准后开大会宣布。

1972年4至5月，自治区党委组织调查组对1962年西吉县“马连江阴谋叛乱案”、1962年隆德县“赵宝、朱自治预谋叛乱案”、1967年西吉县“以马跃清、马荣瑞、米宝德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阴谋暴乱集团案”、1958年固原县“阴谋叛乱案”进行复查，开始纠正“平叛扩大化”问题。²7月底这一工作基本结束。

此后，民族政策有所调整。例如1973年10月19日《宁夏日报》报道青铜峡县大力发展养猪事业，只计算了汉民农业户，可能已停止鼓励回民养猪政策。

上述平叛扩大化涉及人员数字系指文革期间。对文革前的“平叛扩大化”问题，直到文革后才全面平反。据《当代宁夏简史》数据，对于1958-1960年的“平叛扩大化”的平反，共涉及17922人。³1987年统计为18737人。⁴

七、揭批查

1976年10月事件发生后，宁夏照例批判“四人帮”，但原来各派之间的斗争乘机重起。1977年1月10日自治区委发出2号文件，11日宣布对革委会副主任安建国办学习班，号召揭发他的问题。1977年1月18日康健民因心脏病突发去世。19日中央任命霍士廉为宁夏区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并陆续调整了宁夏党政班子。

¹ 《当代宁夏简史（1966.5-1976.10）》，黄河出版传媒集团、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317页。

² 同上第233页。

³ 张远成《当代宁夏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170页。

⁴ 《当代宁夏史通鉴》，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123页。

3月26日到4月11日，自治区召开区委常委扩大会议，接着开三级干部会，揭批“四人帮”。4月初解决党委组织部被夺权问题。揭批联系“原自治区主要领导人”，批判其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受“四人帮”影响而犯了错误。康健民是陕北系干部，曾任一野第一骑兵师师长，在宁夏任职的六七年中并无很大作为。他的错误，可能主要是在1976年的“批邓”问题。

从1976年12月到1977年1月，结合批判“四人帮”帮派体系，银川市委开始批判市委副书记鱼化龙，定其为“重大反革命事件”当事者，后将其逮捕并开除党籍。8月8日，自治区党委暨银川市委召开大会，批判“现行反革命分子”鱼化龙。鱼的主要“现行”问题是于1976年10月27日书写“反动标语”，攻击“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¹华国锋下台后的1980年4月，自治区党委将其改判为“犯严重政治错误，给予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另行分配工作”并恢复了党籍。

1977年7月31日，自治区召开广播大会，之后又下发了中央7月29日关于宁夏问题的批示，宣布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王志强和区党委副书记赵志强停职审查，王志强公开点名批判，赵志强党内点名批判。

8月17日，中央又任命杨静仁为自治区党委书记。1977年12月，霍士廉当选为自治区革委会主任，次年4月当选为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1979年2月，霍士廉调任农业部部长。

经中央批示，1978年1月3日自治区党委宣布对革委会副主任安建国免职审查。1月30日在广播大会上对起进行批判。1983年底到1984年初，自治区党委开始清理“三种人”。工作历时约两年，共清查1193人，最后定“三种人”8人、犯严重错误57人、一般错误267人。

在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中，“青铜峡事件”再次成为一个“事件”，是在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3月。当月，宁夏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撤销中发〔67〕407号文件的批复和关于为“青铜峡反革命叛乱事件”平反昭雪的批复，宣布了兰州军区党委对宁夏军区《关于为原宁夏军区党委和朱声达、江波、何其仁等同志平反的请示报告》。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邵井蛙在平反大会上称：“所谓‘青铜峡反革命叛乱事件’，完全是康生伙同×××²等一手制造的一大冤案。……直接责任应由康生等负责。”此结论把首要责任推到康生头上，当然完全不符合事实，因为康生只是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而且，康生在1967年9月20日接见宁夏代表时说：“我今天负责地告诉同志们，青铜峡的问题是经过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³ 冼恒汉在他的回忆录中认为自己是冤屈的也有道理，因为是在执行中央

¹ 《愤怒声讨现行反革命分子鱼化龙的滔天罪行》，《宁夏日报》1977年8月10日。

² 应为冼恒汉。

³ 《当代宁夏日史(1966.5-1976.10)》，黄河出版传媒集团、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70页。

决定，但是作为兰州军区负责人，也应负一定责任，因为情况是他们汇报给中央的，处理方案也是他们拟定的。

【史林一叶】

康健民率部入宁

余汝信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余汝信正在撰写中的书稿《风暴历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纪事》。本刊已选发过该书稿中的《十二军入皖》（2017年7月30日第94期）、《文革风暴前夕的人民解放军》（2018年7月30日第114期）、《军队在文革风暴初起时》（2019年3月30日第126期）、《吉林驻军的“三支两军”》（2019年6月30日第131期）、《黑龙江驻军的“三支两军”》（2019年8月30日出版的第136期）、《辽宁驻军的“三支两军”》（2019年10月30日第139期）、《甘肃驻军的“三支两军”》（2020年1月30日出版的第144期）、《陕西驻军的“三支两军”》（2020年4月30日第151期）等章节。作者将部分书稿提供给本刊先行发表，以便征求更多读者的意见，进一步作好修改。

一、宁夏驻军简况

1967年初，宁夏回族自治区面积6.6万平方公里，为全国面积最小的省区。其驻军数量亦少，仅为1省级军区及所辖1独立师和野战部队3个团。

（一）宁夏军区

领率机关驻自治区首府银川市。所辖军分区仅1个——固原军分区，1独立师及直辖2市（银川、石嘴山）11县人民武装部。司令员朱声达，副司令员张怀礼、陈阳春、刘德夫、赵炳伦，副政委江波、马克，参谋长陈阳春兼，政治部主任向辉宇。¹

宁夏军区独立师，1966年7月由宁夏公安总队改编，师部驻银川市，代号8137部队，师长涂宗德，政委缺。下辖步兵第一、第二、第三团。步兵第一团（8128部队）由宁夏军区步兵第六团改编，驻银川市。步兵第二团（8129部队）由宁夏公安总队直属团改编，驻平罗县城。步兵第三团（8130部队）由银川公安支队改编，驻银川市。其部队主要分布在银川、石嘴山、惠农农场、平罗潮湖农场及吴

¹ 朱声达，1955年授衔少将。赵炳伦、江波，1961年晋升少将。张怀礼、陈阳春、刘德夫、马克、向辉宇，在1965年取消军衔制之前均为大校军衔。

忠、中宁、中卫、青铜峡等地执行警卫、守卫、看押等任务。

（二）陆军第六十二师驻宁部队

1967年8月以前，陆军第六十二师师部驻甘肃平凉县，代号8037部队。所辖步兵第一八五团（8047部队）自1961年7月即驻宁夏青铜峡市。步兵第一八六团（8048部队）自1962年9月驻宁夏固原地区。炮兵第三四二团（8050部队）自1966年9月驻宁夏西大滩执行垦荒生产任务。另所辖步兵第一八一团（8046部队）在兰州市支左。该师虽在1967年2月已由兰州军区归还二十一军建制，惟二十一军对其只管部队工作，其三支两军任务则由兰州军区直接领导。

二、从夺权到康健民率部入宁

在上海“一月革命”的影响下，1月25日，《宁夏日报》发表了银川地区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等二十二个组织的《紧急通知》，声称“坚决开展全面的夺权斗争”，并于当日组成了宁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联委会）。1月27日，联委会夺了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的党、政、财、文大权。同时，还接管了银川市的党、政、财、文大权。联委会在“夺权公告”中宣称：“一切领导权，由本联合委员会接管，委员会下设文化革命委员会和生产建设委员会。”此后，夺权之风刮遍宁夏各地。¹宁夏夺权并未得到中央的承认。

1月27日，宁夏军区党委决定支持“宁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派部队参加宁夏夺权庆祝大会，并指派副司令员张怀礼参加宁夏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工作。2月5日，宁夏军区派部队参加宁夏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召开的巩固夺权斗争胜利大会。2月11日，宁夏军区决定退出宁夏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召回张怀礼副司令员，并发表关于撤销对宁夏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的一切支持和援助的声明。同时，对自治区公安厅、银川市公安局、宁夏日报社、宁夏人民广播电台、银川市有线广播站、农建十三师实行军事管制。自撤销对宁夏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的支持后，宁夏军区转而支持宁夏革命大联合筹备处。²

3月10日，保守派群众组织银川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处（筹备处）成立。3月12日，宁夏军区表态支持筹备处。3月18日，造反派群众组织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总指挥部）成立。6月19日，宁夏地区第一次较大规模的群众武斗在石嘴山市发生。³

¹ 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党校、宁夏回族自治区档案馆：《中共宁夏党史大事记》，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361。

² 宁夏军事志编纂委员会：《宁夏军事志》（下），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967。宁夏军区退出联委会时间原书为2月21日，根据《中共宁夏党史大事记》改为2月11日。

³ 《中共宁夏党史大事记》，页361-362。

7月26日，筹备处更名为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处（仍简称筹备处）。8月1日，总指挥部调集石嘴山工人造反组织等攻打筹备处所在地银川西塔，将筹备处赶出银川。8月8日，总指挥部、筹备处两派在永宁县大观桥发生大规模枪战，武斗进一步升级。随后又在永宁、吴忠、银川、平罗等地发生大规模武斗。

自7月下旬，宁夏军区司令员朱声达赴兰州向军区党委汇报。据朱称，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拒不接见他。8月8日永宁武斗后，冼称是“朱声达开了枪”。次日，朱从兰州返回银川，动用战备密码，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发报，请求到中央汇报宁夏文革情况。

8月12日，由于中央认为宁夏军区在三支两军中犯了“严重方向路线性的错误”，遂派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康健民率8037、8119部队¹接替宁夏军区，负责宁夏三支两军工作。并重新建立了以康健民为组长、张怀礼、徐洪学为副组长的支左领导小组。8037、8199部队表态支持宁夏总指挥部，并于18日撤销了对筹备处的支持。²

8月14日至12月底，宁夏军区司令员朱声达，副司令员陈阳春、张怀礼，副政委江波、马克，副参谋长刘恒业，政治部主任向辉宇、副主任何其仁、乔克广，后勤部副政委薛文亨，独立师师长涂宗德、副政委王兴云，固原军分区政委田有胜以及机关和团以上单位的有关人员共47人，在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解决宁夏问题的会议。在此期间，根据兰州军区指示，宁夏军区系统暂时停止三支两军工作，机关进行整顿。³

三、“青铜峡事件”

1967年8月12日，陆军第六十二师奉命在师长姜玉安、政委李天冲、副师长徐洪学、副政委孟移山、参谋长王晨光、政治部主任赵书堂率领下，担负宁夏大部分地区的“制止武斗，稳定局势，保护左派”任务。基本部署为：师部带步兵第一八五团进驻银川市，步兵第一八六团进驻吴忠、灵武、青铜峡地区，炮兵第三四二团进驻平罗、石嘴山地区。⁴该师前指于12日18时进抵银川，一八五团、炮兵三四二团移防亦称顺利，惟一八六团进驻途中受阻。

时一八六团团长王林，政委许昌其。据许昌其在2002年称：

¹ 康健民，1955年授衔少将。8119部队为炮兵第十五师炮兵第八团的代号。1967年9月该团由原驻地甘肃进驻贺兰县、永宁县执行三支两军任务。

² 《中共宁夏党史大事记》，页362。

³ 《宁夏军事志》（下），页967。

⁴ 兰州军区守备师史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守备师（原陆军第六十二师）师史》，1992年，页174。

在驻固原期间，一八六团原倾向于保守派“筹备处”。师里通知我团，说我们支左支错了，要转观点，支持造反派“总指挥部”。团主要领导一时转不过弯来，全团上下也转不过弯，但通知下来，只得执行。

8月中，我团奉命由固原进驻吴忠支左。开始去了两个营，一个营留守固原。当部队行进至离吴忠约二十公里处时，被保守派“筹备处”围住，不能前进。保守派听到风声，说我们到吴忠是支持“总指挥部”的，“筹备处”发动支持他们一派的农民，睡在公路上，我们整整一天都前进不了。请示师里，师里也不回电话，到晚上，派团副参谋长和保守派谈判，未有结果。师政治部副主任正好因事经过此地，要他再请示师里，亦无回音，团党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不能动武。

被围困的地方，叫高米子湾，是一公路岔口，离青铜峡大坝下的一八五团团部原驻地约七八公里。一八五团主力已随师部进驻银川，原驻地仅有小部分人留守。拂晓时分，我们团领导决定部队突围到一八五团团部，刚走不到两公里，就被堵住了，农民们睡在公路上，还挖了坑。至中午，勉强前进到一八五团团部驻地，农民又围了上来，干部战士情绪很大。而保守派甚至扬言如果部队再往前开，就要炸掉大坝。为防不测，我率团基本指挥所在大坝上警卫，团长则留守在大坝下的团部。

8月28日傍晚，徐洪学来电话，要求作好反击准备，中央有电报，马上会转到。晚上九时至十时左右，六十二师转军委电报，要求要出击，坚决打下去。我命令枪朝天打，但部分干部战士有情绪，混乱中向群众开了枪，造成在大坝上的部分群众死伤，死了四十多人。¹

一开枪，不仅是青铜峡，整个宁夏都平静下来了。²

“青铜峡事件”的特殊性在于：文革中与军队发生流血冲突的，普遍都是造反派，而“青铜峡事件”中部队开枪打死打伤的，却是保守派。

冼恒汉文革后回忆道：“后来查清楚，由于派性，当时宁夏的一派群众组织企图以暴力手段制造事端，胁迫驻宁夏的支左部队和兰州军区乃至中央来支持他们。所以，扬言要爆炸青铜峡水库的大坝，造成黄河决口，淹没下游。”³冼未指明的是，所谓“当时宁夏的一派群众组织”，实际上就是保守派筹备处。

至于北京方面的态度，冼恒汉在回忆中说：“收到六十二师报告的当天晚上，

¹ 据官方资料，群众死亡104人，伤残133人。见青铜峡军事志编纂委员会：《青铜峡军事志》，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页25。

² 访问许昌其谈话记录，2002年9月12日，西安。许昌其的仕途并未受青铜峡开枪事件影响，1969年10月后历任师政治部主任、总政组织部处长、师政委、军政治部主任、军顾问，1988年离休。

³ 冼恒汉自述：《风雨八十载》节选，下同。<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09/09/21135.html>，最后访问：2020年4月13日。

我召开军区常委会议，常委们一致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将宁夏的原电报转报中央。第二天深夜，总理亲自给我打来电话，听得出来总理非常着急，他说，报告收到了，你们提个处理意见报中央。要驻宁夏部队派人守护大坝，决不能发生爆炸事件。”兰州军区随即报送的处理意见中提及，如有人不听鸣枪警告继续进行爆破活动，并在部队阻止当中有人开枪向部队射击时，“部队可以还击”。

冼又说：“到了八月二十八日凌晨，康生给我打来电话说：‘总理委托我叫我给你打个电话，你们关于青铜峡的处理意见报告，中央收到了，毛主席也看了，政治局也研究了。中央同意你们的意见。’我接到电话后，又立即召开常委会进行了传达，并且立即把中央的决定和军区的意见告诉了宁夏支左领导小组康健民、徐洪学同志。”

冼又说：“后来听汇报说，在部队对空鸣枪警告后，一些群众仍不停止爆破活动，准备炸坝，并且群众中有人向部队开枪射击，有两名战士倒下，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指挥员被迫下令开枪还击，一场流血事件没有避免。”¹而现场指挥的许昌其在回忆中，并没有指筹备处有“准备炸坝”的实际行动（只有“扬言”），也没有群众“向部队开枪射击，有两名战士倒下”这样的严重情节。惟在当时的紧张氛围之下，筹备处一派某些人的“扬言”，足以害死自己。

四、从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到自治区革委会的成立

1967年12月9日，在支左部队领导下，由宁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宁三司）、宁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宁总司）、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处（革命造反派）（筹革造）、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总指挥部）四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在京共同签订了《关于实现宁夏革命大联合的协议》。

12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毛泽东批示“照办”的《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全文如下：

（一）宁夏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广大革命群众同杨静仁，马玉槐²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于一月二十七日夺了他们的权。

现在，宁夏各派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在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教育和帮助下，在京签订了《关于停止互相攻击、收缴武器、制止武斗的协议》和《关于实现宁夏革命大联合的协议》。中央认为，这两个协议很好。希望各革命群众组织

² 杨静仁，原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人委主席。马玉槐，原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委党组书记、副主席。

在宁夏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保证贯彻执行。

（二）宁夏军区党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个错误应由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朱声达同志负主要责任。宁夏军区党委对他们的错误的检查是好的，态度是诚恳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朱声达同志经过中央的批评教育和群众的帮助，作了检讨，表示愿意改正错误，中央欢迎他这种态度。¹

（三）中央派到宁夏支左的六十二师等部队，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希望他们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做好“三支、两军”工作，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新功。

（四）宁夏地处边疆，又是少数民族地区，阶级斗争是尖锐的，情况是复杂的。广大革命群众和全体指战员应当积极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加强革命群众之间的团结，加强军民之间的团结，提高革命警惕性，严防美蒋、苏修、蒙修特务的破坏活动。

（五）中央决定建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康健民、张怀礼、徐洪学、王志强、李天冲、许冲波、乔克广、李江烈、丁毅民、陈养山同志²以及革命群众组织代表若干人组成。康健民同志任组长，张怀礼、徐洪学、王志强同志任副组长。筹备小组中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应按革命大联合的精神协商提出，报中央批准后参加。

各革命群众组织都要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直接领导下，认真学习和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学习林副主席“八·九”重要讲话和江青同志“九·五”重要讲话，以“斗私，批修”为纲，开展革命的大批判，逐步实现按系统、按单位、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搞好革命的三结合和本单位的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把宁夏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³

1968年2月20日，经兰州军区批准，银川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由第六十二师后勤部政委张晓林任主任。

3月20日，经兰州军区批准，石嘴山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炮兵第三四二团团团长于学进任主任。

¹ 1968年元月，中央让朱声达到北京空军学院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宁夏班接受批判教育。7月间又到海运仓总参招待站继续检查“错误”。1969年10月被下放到陕西省蒲城县独立师农场强迫劳动4年。1973年10月降任甘肃省军区副司令员。文革结束后于1979年2月为青铜峡“反革命叛乱事件”平反。

1979年后任甘肃省军区顾问组组长和甘肃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1983年10月离休。1985年1月中央军委下达了撤销降职命令和晋升正兵团职（从1983年10月离职休养算起）的命令，同月21日在兰州病逝。

² 王志强，原自治区交通局副局长。许冲波，炮兵第十五师政委。李江烈，原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丁毅民，原自治区建工局局长。陈养山，原自治区人委副主席。

³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政工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一）》，1968年8月，页889-892。

3月21日，兰州军区党委发布《关于组成宁夏军区临时党委的决定》，由张怀礼、赵炳伦、刘德夫、陈阳春、向辉宇、乔克广、贾继毅¹、薛文亭等任委员，张怀礼任书记。

4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作出毛泽东批示“照办”的《关于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称：

中央同意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三月二十三日关于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同意宁夏革命委员会由八十一名委员组成，同意报告中所提的革命委员会委员和常委的名单，同意由康健民同志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怀礼、徐洪学、王志强、安建国同志²任副主任，另留两名副主任的名额，待以后增补。

中央热烈祝贺宁夏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宁夏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和各族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揭出了以杨静仁、马玉槐为首的宁夏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了他们的权，罢了他们的官，击退了阶级敌人的猖狂反扑，开展了革命的大批判，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了丰功伟绩。

中国人民解放军宁夏驻军和宁夏军区广大指战员，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指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宁夏革筹小组成立以来，深入宣传和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促进了革命大批判、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发展。

中央希望：

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要紧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路线，全面落实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各项指示，进一步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深入地进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高岗、习仲勋、刘澜涛及其在宁夏的代理人杨静仁、马玉槐等的反革命罪行，揭深揭透，把他们彻底批倒批臭。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反对形“左”实右的反动思潮。……³

¹ 贾继毅，时任宁夏军区后勤部副政委，1968年6月任宁夏军区独立师政委。

² 安建国，宁夏大学数学系毕业学生，宁夏总指挥部总指挥。

³ 《关于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1968年4月4日。中发[68]55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

4月10日，在银川召开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大会发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不到长城非好汉——热烈欢呼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在庆祝大会上，革委会主任康健民发表了《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宁夏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讲话，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宁夏军区副司令员张怀礼发表了《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讲话。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宁夏驻军支左小组组长徐洪学发表了《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坚决保卫红色政权》的讲话。

8月21日，自治区革委会发出《关于成立固原专区革命委员会的指示》，固原军分区司令员李凯国任专区革委会主任。

【浩劫墓碑】

文革中的宁夏英烈

不平

宁夏，地处边远，但是，那边的人士却是忠勇可嘉，令中原赧颜。文革中，主要的有三大案：朱守忠案、余渭国案、“共产主义自修大学案”（简称“共大案”）。《当代宁夏简史》、《宁夏通志司法公安卷》、《宁夏审判志》、《当代宁夏史通鉴》都提到了三大案，《当代中国的宁夏》、《宁夏公安志》提到了“共大案”，《宁夏通志人物卷》提到了朱守忠案。

《宁夏审判志》记载：

各级人民法院在复查中，优先复查因反对林彪、“四人帮”，为邓小平遭诬陷鸣不平而被判刑的案件（简称三类案件）和判处死刑以及处刑较重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对其中明显错判，人还在押而一时又来不及复查结案的，先放人后结案。在具体政策的掌握上，按照中共中央的有关文件精神，本着“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不错不平”的原则，对那些纯属反对林彪、“四人帮”和为刘少奇、邓小平遭诬陷鸣不平而被判刑的案件，一律平反纠正，宣告无罪；把反对林彪、“四人帮”作为主要罪行判刑的，则实事求是地依法改判；对给中共中央或领袖以及报社写信提意见、反映情况，或者私下议论、记日记、写文章、书信，就一些理论问题以及党的方针政策表示不同见解或不满意的，言词尽管过激，也甄别纠

中央办公厅 1968 年 4 月 6 日发出。康健民任宁夏党、政一把手接近九年，1977 年 1 月 18 日因患心脏病突然恶化，经多方抢救无效，在银川逝世，终年六十岁。

正，宣告无罪；对于无意喊错口号，胡写乱划形成反动词句的，或由于一时一事不满，书写或散布了有损于共产党、领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以所谓“恶毒攻击”罪而判刑的，一律不抓辫子，不留尾巴，宣告无罪；以“政治疯子”而判刑的精神病案件，一律宣告不负刑事责任；以“投敌叛国”和“与敌台挂钩”罪名而判刑的案件，则按照中共中央批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几类案件进行改判的政策界限的规定，分别不同情况予以纠正或改判……

这段文字说明了宁夏英烈的存在，下面再看数量，《宁夏审判志》中说：

因反对林彪、“四人帮”和为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遭诬陷鸣不平，而被定为反革命罪判刑的案件（简称“三类”案件）。据 1978 年 11 月 24 日的不完全统计，全自治区共判处“三类”案件 130 件 214 人，其中判处死刑的就有多人。

我们就拿安徽省来比较一下，《安徽省志司法志》中说：

据 1979 年至 1982 复查统计，在改判纠正的反革命案件中，因反对林彪、“四人帮”，为邓小平鸣不平而被判刑的计 1368 件，占改判反革命案件总数的 16.4%。

宁夏作为当时在全国面积最小的省区，就出现了这样一些不屈的文革英烈，如《宁夏审判志》中说的“其中判处死刑的就有多人”，这里面包括有“共产主义自修大学现行反革命集团案”的鲁志立、吴述樟、吴述森，以及个人单独成案的朱守忠、余渭国。

《宁夏审判志》还提到另外两件最终得到平反的“反革命集团案”也涉及多人：

海原县革委会保卫处对“以杨如德为首现行反革命阴谋暴乱集团（代号 102）”一案的杨如德等 7 人判处死刑，对其他 29 人分别判处徒刑，11 人 免刑，1 人保外就医。后此案得以平反。

西吉县革委会保卫处对“马跃清为首的反革命预谋暴乱集团（代号 301）”一案的马跃清等人判处死刑，并判处 2 人死缓、6 人无期徒刑、28 人有期徒刑。后此案得以平反。

这两个案件语焉不详，没见到详细的案情介绍。

笔者的感觉，宁夏在文革中，镇压是比较严厉的，而《宁夏审判志》是写得比较好的一本志，三大冤案在“大事记”和“全面复查冤假错案”中都有比较详

细的描述，其他的一些被处以死刑的案件也说清楚了。如果同《甘肃省志审判志》比较一下，《甘肃省志审判志》虽然对毛应星案说得比较详细，但王笃良案便没有提及。

比较有趣的是《银川市志》。《宁夏通志司法公安卷》提到了三大案：

朱守忠案——“（1969年）8月5日，朱守忠因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被自治区革委会保卫部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1970年2月，银川市革委会保卫部又以抗拒改造罪，判处其死刑。1979年11月14日，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撤销自治区革委会保卫部判处朱守忠无期徒刑的判决。同年11月20日，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判决，宣告朱守忠无罪。1980年5月2日，自治区党委向全区发出《关于学习优秀共产党员朱守忠同志模范事迹的通报》。之后，民政部追认朱守忠为革命烈士。”

余渭国案——“（1970年4月29日）是日银川市革委会保卫部对宁夏地质局技术员余渭国因反林彪，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1979年6月5日，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余渭国平反昭雪，宣告无罪。”

“共大案”——“（1970年）8月21日银川市革委会保卫部对所谓‘共产主义自修大学现行反革命集团’一案的吴述森、鲁志立、吴述樟判处死刑，并判处陈通明无期徒刑，张绍臣、张维智、徐兆平有期徒刑。1978年5月14日，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判决，对所有判处的人员平反昭雪，宣告无罪，自治区党委、自治革委会并于5月5日在银川市为该案召开了平反昭雪大会。”

所以，这三大案与银川都是有关的。可是，在《银川市志》中，仅在“大事记”一节中提到了余渭国，其余就没有了。其中，余渭国是银川人士，“共大案”发生在银川，《银川市志》如此处理，显然不当。比较一下，朱守忠是中卫县的教师，《中卫县志》在“大事记”和“人物”均提到了朱守忠。

朱守忠和余渭国都是来自上海。朱守忠1958年来到宁夏，余渭国原籍上海，1959年由北京地质学院毕业来到宁夏。所以，就这两个人的个性来说，说是上海养成的并不离谱，笔者以为，可以称他们为宁夏“输入型”的英烈。而最后，朱守忠也是归葬上海。两人既是笔者的同乡，又是笔者的同道。笔者深为他们骄傲，与有荣焉。

朱守忠

朱守忠（1920—1970），是一位响当当的文革英烈，在百度百科、搜狗百科、互动百科，都有收录，如果评选文革十大英烈的话，应该榜上有名。

文革中，舒赛在北京市区贴出了大字报，陈耀庭先后书写了 12 篇文章，分别投寄给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陈毅以及党中央、人民日报、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广州、成都、福州、南昌、赣州等省、市的部队党委及大、中学校或个人。他们公开站了出来进行抗争。朱守忠和他们不同，只是在单位里进行了抗争。从这点说，他和张志新比较类似。

朱守忠可谓是有胆有识，而其经历之曲折，与舒赛有相似之处，忠诚于中共，受尽委屈，矢志不渝，令人感叹。从上海这样一个大都市来到边远的小地方，而能任劳任怨，已经是不容易了，其最后所写的诗，体现了他对边远地区的热爱。文革中，能够弃小我成就大为，置个人的委屈于不顾，挺身而出，抗争文革。真英雄也。

朱守忠，本名朱守中，男，上海市人，出身于殷富之家。1937 年上海沦陷，朱守忠的祖母、父亲、母亲被土匪杀掉。1943 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政治经济系，曾参加中共地下外围组织“上海市教协”。1947 年起在上海复旦中学任教。1949 年 8 月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担任团支部书记。1950 年 2 月 22 日，朱守忠成为中共执政后被吸收的第一批共产党员。1951 年他当上了上海教育局业余中教处视导员，1954 年任上海速成师范学校副校长。

1958 年 4 月，上海市虹口区以朱守忠“在反右斗争中退却，隐瞒家庭出身情况”为由，把他定为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清除出党，撤销了行政职务。当时，正值宁夏回族自治区筹备成立，他随上海文教部门调出的 504 名教职工组成的“支宁大队”来到宁夏，先后在中卫中学、中卫一中担任数学教师。

1961 年，宁夏进行“双反”运动，朱守忠被当作“坏人”揪出来送到大坝挖渠。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下，他病倒了。

病后，他回到上海。此后上级党委将朱守忠的问题甄别了，并口头通知恢复了他的党籍。朱守忠病愈回到宁夏后，第一件事就是忙着补交几年的党费。可是他得到的回答却是冷淡的：“等见到上海的正式批文再说。”朱守忠哪里知道，那个上报的材料还在市委某部长的抽屉里压着。到 1964 年刹“甄别风”的时候，这份平反材料成了一张废纸。之后，他被剥夺了当教师上讲台的权利，发配到学校值班室当门卫。

1965 年初，“面上社教”开始后，他被开除公职，到学校农场劳动。1965 年 6 月，他又被送到了自治区贺兰文教农场。

1966 年 5 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又被扣上“地主分子”、“坏分子”两顶帽子，于下半年被红卫兵强行迁赶到盐池县大水坑一个山区小村庄劳动改造。大队有个有线广播喇叭，离生产队十多里。起初，他为了知道外面的事情，每天很早起来去听广播，但是有人把他赶了回来，说不许四类分子听。1967 年清理阶级队伍

时，因发现朱守忠的所谓“地主分子”和“坏分子”的帽子在档案中无据可查，又把他从农村叫回文教农场。他才知道，外面已经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1968年初，朱守忠为了澄清和纠正自己的错案，回到了上海。如今，展现在他面前的上海已面目全非：大字报、传单漫天遍地，头戴藤条帽的“文攻武卫”队员们威风凛凛，横冲直撞，抄家、挂牌、游街、隔离、逮捕……千万人被关进了“牛棚”，无数家庭惨遭迫害。

朱守忠的家庭早在政治运动中解了体。妻子被作为“分子”家属赶到乡下，两个妹妹挂黑牌子游了街，医学院毕业的儿子无处分配。他家住30年的房子，被勒令交了出去，一家4口人挤在一间不到12平方米的亭子间里。

晚上，妻子向他诉说着家庭这几年的苦难和变化。朱守忠默默擦去妻子脸上的泪水，安慰她：“往事没有什么好提的。我还活着，就是幸运。我这次回来，就是想搞清自己的问题。”他取出带回的申诉材料，向妻子打听过去那些老领导，老同事的下落。妻子告诉他，所有这些人，不是被隔离专政，就是靠边挨斗，不会有人出来作证了。朱沉默半晌，自言自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把申诉材料一撕两半，从此，再不提个人冤屈。

他的视线，超越了自己和家庭，开始为党和国家的命运担忧。每天天不亮，他跑去看大字报，并搜集了大量的小报、传单，悉心研究。深夜里，还不停地翻阅报章杂志。“守中，你要干什么？”妻子干涉了。他却反问道：“上海是全国工业中心，过去日夜三班开工犹嫌不及。现在武斗停产，只得动用库存物资。一旦库存告急，日用品再一闹荒，人民如何生活？这种隐患，中央可曾想过？”妻子惊恐地劝说：“你不要杞人忧天好不好？！”朱守忠回答：“杞人忧天总比没人忧天好！”

回宁夏之前，他把全家叫在一起。他嘱咐妻子和女儿：“我们这种家庭，呆在上海这个大城市里，已经极不相称。千万不要把这个亭子间，看作是安乐窝。在生活的道路上，必须做好最坏最坏的打算。”他对儿子说：“文化大革命中，你当逍遥派，借佛游春，到处串游。来往火车票钱和所借膳宿费，必须如数清算，归还国家。这对全国来说，是一笔可观的数字。不能学别人坏样，见便宜就占，此其一；其二，你虽大学毕业，但不能随便向国家伸手闹分配，首先要想到国家当前存在的困难，特别是为一般人所窥察不到的困难。自68年以来，历届积累待分配的大学生就有数十万。要求一下解决，决非易事。因此，你可申请继续留校实习，或直接主动要求到农村去，和农民过一样生活。党和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并非教会他们出去如何挣工资拿钞票，而是教会他们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对待政治要高标准，高了还要高；对待生活，要低标准，够吃足矣！”说到这里，朱守忠继续说：“这些话，你一时理解不了，也难以接受。但是，总有一天，你会恍然大悟的……”他对着两个哭泣的孩子说：“我对不起你们，没有尽到作父亲

的义务，犯了‘养不教’的过。但不论我今后如何，你们一定要永远记住党的恩情。我们之所以有今天，完全是党苦心培养的结果。要坚决听党的话，随时随地替党分愁解急，先天下之忧而忧。我现在是‘专政对象’，没有资格当你们的家长。今后还能否见面，就更难说了。希望你们还是早早忘了我吧！”

这是朱守忠和家人诀别时说的最后一席话，后来记载在他亲手写的“自传”中。

回到宁夏以后，他努力干活。有人劝他给家里写封信，哪怕告诉一下自己的下落也好。朱守忠总是说，“我没有家，无家一身轻，我可以随心所欲。”有人问他，当前社会上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他说：“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生产力，使人民过上美好的生活。并不是要大家勒紧裤带，你打我，我打你，天天制造阶级斗争。当前主要矛盾，说得冠冕一点，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说得赤裸裸一点，就是粥少僧多，人浮于事。”“我看，马老先生（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有道理。每天咧着七亿张嘴嗷嗷待哺，这个场面，决不能侧目不视。一旦在粮食问题上闹了荒，世界上哪个国家也帮不了忙的。要当好这个家，确实不容易。”

7月，朱守忠当着同屋人的面，开始把他深思熟虑过的观点，毫无保留地亮了出来。

“首先，我对刘少奇主席以及中央首长和各级领导被百般丑化、揪斗毒打等野蛮做法，深为不满，反感极大。再有，对大规模打击民主党派、民族资本家和高级知识分子，随便抄家抓人，随便没收财物，随便烧毁书籍文物，随便禁演戏剧电影，随便践踏‘双百方针’，置‘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于不顾等等粗暴做法，表示愤慨！”“这次文化大革命，说穿了，是党内少数野心家、坏家伙，为了争做老大老二，称王称霸，独吞胜利果实，大搞其清一色，不惜采取排除异己，出卖同志、杀戮功臣、篡军篡政、焚书坑儒等卑劣手段而创造的一场大阴谋、大悲剧，竟然将刘少奇等一批元老、忠臣，一棍子打入十八层地狱。此可忍，孰不可忍？”

他说：“我对毛主席是钦佩的。毛主席不愧是全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但他从来不认为领袖就是神，理论可以就此止步。他说：“现在有人高喊什么‘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等等，等等。我看说得过分了，连主席本人都通不过。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竟然有人胡扯什么谁反对林彪都是‘反革命行为’，都要‘依法惩办’。简直是越说越不成话了。难道真的想用‘强权’代替真理？难道真的想搞法西斯独裁？这是白日做梦，办不到，因此，这使我对‘天天读’这一套，更加不以为然。特别是动辄喊‘万岁’，天天唱‘东方红’，早上拜，晚上拜，开会拜，闭会拜等等，仪式繁琐，我看更不必。最近又大搞什么‘忠字化’，竟然把主席当做偶像、佛爷来供祀，真是花

样层出、劳民伤财，长此胡闹下去，到底是不是好？主席本人究竟知道不知道这些？我总表示怀疑。因为我深知主席他老人家一向是虚怀若谷的。以前曾有人提议要为他老人家年年做寿，还打算把某个大城市和某条大马路用主席的名字来命名，可是主席一概反对。”

对那些拜神活动，朱守忠从来不参加。别人早请示晚汇报时，他或是借故躲开，或是侧目而视，默不作声。为了这些，他遭到多少折磨。但不管怎样批斗、捆打、侮辱、强制，他从来没有服过。

在朱守忠 1968 年私下谈话和写的材料中，他先后评论了数十人，他说：

“刘少奇同志在我的心目中，始终是个好党员！”

“我对当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提出的‘意见书’拍手称好，赞他倾诉的尽是忠言，不可多得，并为彭德怀被罢官大为不平……”

“陈毅说：‘难道全国党员，就剩下中央文革几个好人吗’，我深有同感，而且做了补充……从照片上，我见到罗瑞卿的脚骨受了重伤，用箩筐抬着批斗，一直想不通，始终不忍于心。这算‘文斗’么？搞得如此，叫他今后怎么办？他身居总参要职，是特大功臣之一，不能随便否定……传闻贺龙两句牢骚诗：‘一声传进京，杯酒失兵权’，我认为不平则鸣，不足为怪……”

对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丑化彭真、曹荻秋、陈丕显等老一辈革命家和王光美等同志的污言秽语，朱守忠一一加以驳斥，说：“这全是谣言！分明是恶意中伤！将来应该追根寻源，彻底肃清流毒。要不然，不但严重损毁了这些高级首长的人格名誉，而且更严重地损害了我们党的崇高威信。”

他说：“林彪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还不是想贪天之功，攫为己功？集其功于一人。真太不明智了。”

“什么江青？蓝苹！蹩脚的三等明星，算是老几，也想出来指点江山。原来是《王老五》的配角，今天一跃而为中央头目，妄想以‘老佛爷’慈禧自居，有谁服气？我就不理这一套！”

“叶群在以前谁也没听说过是干啥的，要不是林彪的老婆，怎么也爬不进‘中央’。像这种做法，岂不成了‘夫妻老婆党’？”

“张春桥以前也是没啥名气的小角色。在上海人心目中，威信不高。都说‘矮个儿里挑长个’，没个好货！”

“姚文元以前是个无名小卒，这次文化大革命，投上了机，接连写下《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评陶铸的两本书》等文章，一下子钻进了党中央。上天入地，爬上了天安门，飞到了地拉那。真是后来居上，出足风头。”

“陈伯达自以为中央唯一的‘理论家’，看来也快不行了。康生是中国的贝利亚，一直是搞‘契卡’的，‘宁左勿右’，不知有多少人吃了他的大亏……”

他公开宣称：“我这个人，一向很顽固，别的事可以迁就，就是不拿原则做交易。要怕斗，我就不叫朱守忠了。”为了表示自己忠于党的决心，他索性在自己名字最后一个“中”字下面加上一个“心”字，在以后的材料落款上都写着“朱守忠”三个大字。

好心的人们暗中劝他：“快打住吧，不要再说了。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呀！”朱守忠泰然答道：“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无家处处家。‘士为知己者死’，我是置一切于不顾了。骂我，打我，批我，斗我，都不在乎。个人恩怨，我全不计较。我可以向任何人弯腰九十度鞠躬行礼，也可以五体投地地跪倒在众人面前，但要我放弃维护党的威信，说违心的假话，我做不来，也办不到！”

1968年12月15日晚，宁夏回族自治区文教农场召开批斗大会，批判朱守忠。

朱守忠面对众人，没有丝毫的慌乱和窘迫。他平静地说：“好吧，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绝不抗拒，我愿意把自己的观点当众亮出来。”他顿了一下，接着说：“我认为把刘少奇说成大叛徒、大内奸，证据不足。特别是报纸上公布的关于建党方面的材料，黑话不黑，都是对的。两报一刊批判刘少奇的文章是站不住脚的。我希望有机会公开辩论。”一席话使人们大吃一惊。被批斗者从容不迫，侃侃而谈：“我对有两个司令部的提法一直是不同意的。很多事不能叫刘少奇一人负责。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事先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的。现在摘引的刘少奇的话，是断章取义，没有从当时的具体条件出发……”

会场上，有人跳起来质问：“你交代，什么地方断章取义了？”

“比如说，少奇同志讲‘资本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这句话，是在建国初期讲的。根据七届二中全会报告的分析，中国工业只占百分之十。因此，我们对资本家不是采取苏联的没收办法，而是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国家主席本着全会决议谈的话，今天拿来上纲，是不正确的。”一席有根有据的话，顿时使提问的人张口结舌。

“‘三自一包’也是七届二中全会提出来的吗？”第二个人赶紧转移了话题。

朱守忠回答：“首先，‘三自一包’的政策不是刘少奇一个人提出来的。在我们国家，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是议、发、行的关系。刘少奇是根据党中央的决议发布的政策，而执行的是国务院。第二，五八年搞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的提法有问题。造成了‘干不干，两勺半’，发生了粮食不够吃，工业无原料，社会紊乱的情况。……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了与之相适应的政策，我认为提出这个政策是有功的，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过去限制太死，与之相适应体现了政策的灵活性，不是道路问题……”

第二位也沉默了。“可刘少奇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第三个以更高的声音喊了起来。

朱守忠仍然以沉静语调反驳道：“少奇同志从来没有提过‘阶级斗争熄灭论’，说‘刘少奇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这是别人上的纲。”

接着是第四个、第五个问题，尽管提问的人气势汹汹，高声大叫，朱守忠却始终沉着自如，有论有据，逐条为刘少奇的“黑话”辩护回答着那些苍白的提问。

于是提问变成挑衅性的了：“你为什么替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翻案？”

朱守忠回答：“不，刘少奇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次全会，党内变动很大。有许多中央委员没有参加。刘少奇本人也应当出席，才能体现党的民主。至少应该列席。可以摆事实，讲道理。根据党章规定，开除党员，本人可以出席提出申诉。定一个人为叛徒，不是简单的事，一定要非常慎重。因此，我仍承认：刘少奇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提问者决定用武力来说话了。几个人抓头发，扭胳膊，拳脚相加，将朱守忠打翻在地……然后，把他提起来，架上土飞机。

“说，刘少奇是不是叛徒、内奸、工贼？”

朱守忠气喘吁吁地抬起头，嘴角流着鲜血，坚定地回答：“刘少奇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个人拿出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念了关于开除刘少奇党籍的那一段，而后，又气势汹汹地问：“刘少奇是什么人？”回答：“刘少奇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字字铿锵有力。

又是一场毒打。跟着有人大喊：“叫他把这话写出来！”朱守忠从容地抹去脸上的血污，擦净双手，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刘少奇是党员”六个大字，下面署着“朱守忠，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八点三十六分”，随后，按上一个鲜红的手印。

感谢当时会议的主持者，把这张纸完整地保存下来，连同这次批斗会的详细记录，使人们看到了当年这场斗争的真实情况。

为了不再给朱守忠“放毒”的机会，不再召开批斗会了，把他隔离起来。但朱守忠却利用这段时间，写了几万字的“检查交代材料”。在一份题为“思想演变”的上百页材料里，他全面地为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辩护和歌颂，对林彪、“四人帮”则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回顾了党走过的道路，充分肯定了党的正确路线。同时，对其中的缺点、错误作了分析、检验，并剖心直谏，诚恳地提出了很多建议，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度觉悟。下面是《思想演变》的部分内容：

68 年底，各报曾集中公布了一批有关《两条建党路线》对比材料，供大家讨论。可是偏偏有人搞‘先入为主’，有意吹毛求疵地罗列了许多有关刘少奇历次的讲话摘录。并且随便加上按语，压上一大堆莫须有罪名。我认为纯属断章取义和无限上纲，言多必失，谁都难免，不应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马列主义必须与具体国情相结合，才能起作用。今天为了更好地总结经验，回过头来，重新检查建党和开国以来的各项政策和策略的正确与否，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首先不能离开当时、当地的历史条件，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伟大、光荣、正确，除了更多更多说不尽的原因而外，还因为：其一，党员在党内一律平等，谁都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权利。其二，真正的共产党员是忠诚、坦白、正直、积极、守信守纪、任劳任怨的。尤其身为全党的领袖，更应该处处为人表率。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治党、治国、治天下。固然，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应该肯定。但是过分突出个人，搞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就要犯大错误，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值得借鉴。‘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要辩证对待。

59 年到 62 年，造成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的主要原因，是人祸，不是天灾。是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过分强调了‘一大二公’，盲目提倡‘吃饭不要钱’等等。这种粗暴做法，严重脱离了当时广大农民的思想实际和农村生产力实际。再加上‘大跃进’中那些‘拔苗助长’‘杀鸡取蛋’等系列反科学的做法，因此不到一年，吃光用光。什么‘五年计划’等等，全落了空。结果是满目凄凉，怨声载道。要不是靠共产党在群众中树立了绝对威信，要不是有千千万万优秀党员、优秀干部、优秀群众的高度觉悟和坚强信心，要不是及时补充了一系列因时、因地制宜的灵活性措施，好容易花了三年多时间，才恢复了元气，我看这‘三面红旗’早就倒了下去，怎么能被保到今天？

更有人竟然把刘少奇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针对国情所提出的‘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面向农村，以粮为纲，以副养农’、‘两条腿走路’，‘产量责任制、扩大自留地，开放自由市场’等一系列方针政策，横加否定，全盘推翻，简直是无理取闹，混账透顶。原因是：社会主义社会是由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来，所以资本主义社会中某些行之有效的办法，必然要继续起作用，包括资产阶级法权在内。所谓‘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产生的。忽视利润，必然会影响扩大再生产。所以无论如何，要竭力反对‘赔本生意’，要大力提倡‘一本万利’，这才是富国强民之道。

至于文教体卫的方针政策，诸如‘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等等，也是无可非议的，可是偏偏有人跳出来予以随便歪曲，恣意诽谤……企图把‘语录本’代替《百科全书》，像这种开倒车的粗暴做法，实质上就是当年秦始皇‘焚

书坑儒’的翻版。要知道，在世界上最复杂的‘万物之灵’正是知识分子。对待他们，必须服之以理，感之以诚，动之以情，循循善诱，耐心争取，细致改造，才有可能促使他们发挥特长，同心同德，共同前进。任何简单野蛮的手段和假仁假义的骗术，必然会得到相反的结果。载舟之水，可以复舟。千万不可忘记这些历史教训……

‘一朝天子一朝臣，朝朝天子出忠臣’，是历史事实。古今中外，都是一样。但所谓‘忠臣’也者，毕竟是寥寥无几，可怜到极点，而且十九死于非命。不是被人忌害，就是坐以待毙。原因很简单：因为‘忠臣’在社会上是没有市场的，到处吃不开。客气一点，则敬而远之，不客气一点，则嗤之以鼻。不是笑他为‘愚忠’，就是讽他为‘傻瓜’。一言以蔽之，常为一般正常人所不齿。要想改变这种现状，更是难乎其难。即使剖心直谏，也是白白送命。刘少奇和彭德怀不就是林则徐和海瑞的再世替身吗？政治上的昏暗到如此地步，求国不危，其可得乎？更可恨的是，直到今天，居然还有不少无耻之徒犹在没命地往刘少奇等几位大忠臣和开国元老身上频投落井之石。这就不能不使我大声疾呼：无论如何，要替刘少奇他老人家等鸣冤叫屈，力鸣不平！誓为他们复仇雪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虽粉身碎骨，也非所计也。要‘反动’就‘反动’到底，决不知难而退，半途而废。即使带了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也算是死得其所，死亦瞑目！

从此，朱守忠被禁止写任何东西，连“交代材料”也不准写了，被赶到集体睡的大铺上去，严密进行监督，任何人不许跟他说话。在人们眼里，朱守忠变得更不正常了。他常在中午休息时，长久地凝望着蓝天远去的大雁或者凝视着渠里的流水。夜里，他在床上辗转反侧，痛苦地呻吟，有时翻身起来，在地上踱步，口里喃喃自语。早上，他光着上身围着灯柱跑步……

农场的领导在讨论朱守忠未来的命运。有人慷慨激昂地说朱守忠是有意“装疯卖傻蒙蔽群众，以达到恶毒攻击的反革命目的”，坚决主张对他依法严办。有人心怀恻隐，斟酌句地说：他确有很多反常现象，胡说八道，不一定是有心。是不是再观察一个时期？最后找出一个折衷办法，带他去医院，检查精神是否正常，再作决定。这实际上是好心的人对朱守忠试行开脱，为他留下的最后一条活路。

然而，朱守忠不接受怜悯，他在大夫面前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病，是他们硬要我来的。”他甚至和医生滔滔不绝地谈话，证实自己神经完全正常。结果，医生在检查单上如实地写上了：“不作精神病处理。”

1969年4月2日，“九大”公报发表。朱守忠仔细阅读，潜心思索。他避开人们，找来纸张，记下自己的看法。4月16日上午，有人报告，朱守忠违反禁

令，又在写字。立时，三个人奔去，从朱守忠手里夺走正在写的两页纸。打开一看，三个人吓白了脸，立刻将纸收走，并再次禁止他写任何一个字。非常可惜的是，两张纸一开始标着大标题“十三”，前面的12个问题现在找不到影了。但就是这短短的残页，朱守忠的观点已跃然纸上，他写着：

十三、我对六九年四月二日召开的所谓‘九大’，是有不同看法的，理由是：

1. 优秀共产党员的代表——刘少奇同志，竟被以最卑鄙的手段排除在外，没有出席这次‘大会’。

2. 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国所有基层党组织在暴力冲击下，已全部陷于瘫痪状态。因此，在这个阶段发展的党员，是不符合党章规定的，一概无效。当然，就更没有资格当代表。入党不是拉伙，开党代会不是进‘大世界’，阿猫阿狗全选了进去，还成什么样子，简直是对我们伟大、正确、光荣的共产党的莫大污辱。

3. 不同意林彪当接班人。因为这意味着将错就错，用强权代替公理，走穷兵黩武之路，是不得民心之举。这是钻死胡同，有进无出，长久不了。

4. 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居然把林彪的名字载进了所谓党章中。这还叫什么共产党党章？这就预示着，‘九大新党章’不久即将随同这位‘接班人’，连同他的所谓‘政治报告’，一起丢进垃圾箱。

三天以后，4月19日，朱守忠被正式逮捕。他既不挣扎反抗，也不激动慌乱，收拾东西的时候，他突然站住不动了，说：“停一下，我有几句话要说。”有人马上加以制止：“什么话也不许你再说了。你老实点！”他一语双关地说：“主席不是说过吗，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不让人讲话，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朱守忠被关进看守所，在狭小破旧的号子里，他心安理得。他对同号的犯人说：“我是‘三元及第’的天字第一号‘坏蛋’，特大‘战犯’。我进看守所，心里亮得很，思想定得很。处我极刑，我也是心悦诚服。我的情绪一直很愉快，但只有一条，历史将来会证明谁是谁非。”审讯的时候，他明确宣称：“谁攻击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我就挺身而出反击！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8月5日朱守忠被判处无期徒刑。判决书中有：“……书写反革命文章……恶毒攻击‘九大’……恶毒攻击林副主席……公开为刘少奇翻案叫屈……死心塌地……判处无期徒刑。”但他仍然坚持真理，大声高喊：“我认为我说的都是真理！”

宣判之后，朱守忠被押往监狱服刑。搬进牢房的当天，他就表白：“过去我有个口头禅，叫做‘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无家处处家’，现在要改成‘失去自由得自由，囹圄之中学技术’，这儿就算是我的家了。”他既不悲愁怨艾，也不谨小慎微。他大声宣布自己的“罪状”，像在旅馆一样说笑谈天。森严的“监规”对他好

像没有约束力，最令人忌讳的政治禁语他脱口而出……在世界上自由最少的地方，他的表现却比自由人更自由。

早上，别人进行“早请示”，他端坐炕头，若无其事。别人责问他，他说：“我一向坚持天天不读，因为仪式繁琐做法过火，像教堂里诵念圣经……所以始终反对，坚决抵制。”并说：“‘语录’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专门规定为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的必读物。这在林彪的‘再版前言’里说得清楚明白。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特别像我这号重刑犯，根本没有资格读。我也就不读！”

犯人们听了这些话，吓得直捂耳朵。有的在干部面前反复陈说，朱守忠如何无休止地“放毒”，如何影响他们的改造。于是不到一个月，朱守忠就被迁到“十三号”。但他毫无“悔改”，依然明确说出自己的观点。个别人为了表示与他划清界限，竟以“违反监规”为理由，对朱守忠百般虐待。干部们训斥他，他却提出要写“交待材料”。于是，朱守忠赢得了写字的权利，他抓紧有限的时间，手不停笔地写着，竟然又写出了几万字。在这些材料中，朱守忠巧妙地给自己扣上无数空洞、吓人的大帽子，装成“交待”“认罪”的样子，但在具体内容上，却系统而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对林彪、“四人帮”一伙反击出更猛烈的排炮，同时，也广泛地表达了他对世界形势、战争与和平、军事、外交、经济、哲学、文化、教育以及民族、司法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下面是部分内容：

林彪在所谓‘九大’政治报告中竟无视自己所欠下的累累新老血债，无视自己的末日已计日可待，闭着眼睛胡说一通，硬把这场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惨败说成是胜利。借以粉饰太平，欺骗百姓……

经过这场文化大革命大杀大砍的大洗礼，文艺方面只剩下了钢琴伴唱《红灯记》、芭蕾舞《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几出所谓“革命样板戏”。唱来唱去就是这几句，演来演去就是这几出。可是偏有人以为是工农兵欢迎的顶呱呱的好戏，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精心杰作。事实上，工农兵根本听不懂、看不来，当面不敢说，背后直摇头。这都要由江青负责。

有人把文化革命以前的一切政策和措施都看成是‘旧’的，说成是‘错’的。我认为，该坚持的还要坚持。

有人胡说什么刘少奇的罪状是‘群众落后论’，这是片面看问题的结果。群众固然不可少，但是主管者和组织者更少不了。虽是少数，却是起主导作用的，这一点，也是不能不承认的，更不能随便降低其威信。

在看守所期间，又听到刘少奇及其夫人身陷囹圄的不幸消息，更是愤痛交集。没有想到作为堂堂一国之主，作为伟大的杰出的政治家，竟如此受屈辱。每想到这里，内心就感到难过到极点，胜同身受。

马列主义是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马列主义也是要发展的，对不适合我国国情，阻碍人类进步的东西，给予必要的‘修正’是好事。

既然称‘回族自治区’，就应该以回民为主体，不能歧视。事实上他们同中东的阿拉伯民族有历史性的关系。是一支有影响的力量，不能忽视和小看。任何大汉族思想都是错误的。

他被带上沉重的铁镣，关到禁闭室。

1969年11月24日，朱守忠被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罪判处死刑。1970年1月26日朱守忠拖着脚镣，被带到审讯室，核实他的罪状，他一一确认，并加以补充。下面是最后的部分审讯记录：

你到这里破坏了哪些？

在同犯中放毒，写了一些反动材料……

你今后怎么办？继续写下去吗？

还写。这不矛盾。别人写材料是为了立功，我是继续放毒。

你今后还继续放毒吗？

这我保证不了。我想说就说。我说的都是真理。

犯人批判过你吗？

批判过。干部也经常在教育而且做到了仁至义尽。但是我“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要不，我就不叫“朱守忠”了！我就是这样，不说反而感到难受，还生怕说少了。只差枪毙算完，不然还要说！

你这样，就判你死刑。

死罪就死罪，我无所顾忌。在我说来，没什么，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也。

你还有什么说的？

没有了。死在宁夏就是死得其所。‘不到黄河心不死’嘛！

以上事实有出入吗？

没有，只能说少了！

这时，审判员心情颇为复杂地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朱守忠，为什么给你最后一个改造机会你都不愿意呢？”朱守忠低下了头，默默思考了一会儿，随后坚定地摇了摇头，坦然地说：“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满不在乎。我，就是顽固到底了！”

这是朱守忠留在审讯记录上的最后一句话。

除夕到了，朱守忠在狱中以掌击节，带镣起舞，引吭高歌，吟诗五首。下录两首：

(一)

宁夏宁夏好地方，遍山遍地尽金黄。
百姓好客良心善，宾至如归接待忙。
银川监狱更理想，铁窗生活赛天堂。
官司一直吃到底，判刑再重不冤枉。

(二)

以牢为家高枕卧，美曲新歌由我谱；
杀头枪毙算个啥？视死如归不在乎。

1970年2月11日，朱守忠在宁夏被枪决。时年50岁。

1980年5月平反，被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追认为优秀共产党员。

朱守忠冤案平反后，自治区党委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并于1980年5月2日发出了《关于学习优秀共产党员朱守忠同志模范事迹的通报》，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上海市委在龙华革命公墓为他修造了墓碑，原中共中卫县委召开了缅怀朱守忠同志座谈会。

据《宁夏审判志》记载：

原中卫县中学教员朱守忠，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反右斗争中定为阶级异己分子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1979年8月3日上海虹口区党委已撤销原处决定)。朱守忠在“文化大革命”中，面对林彪、“四人帮”的横行肆虐，公开痛斥：“林彪想偷天之功，据为己有，决无好下场！”“叶群若不是林彪的老婆怎么也挤不进中央。”并在批判自己的大会上说：“我认为把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罪证不足”，“刘少奇是好党员”，公开为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受迫害遭诬陷抱打不平，反对把林彪定为接班人写进党章。为此，自治区革委会保卫部于1969年8月5日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朱守忠无期徒刑。朱在服刑中宁死不屈，在材料里写道：“林彪在九大的政治报告中竟然无视自己所欠下的累累的新老血债，无视自己的末日已计日可待……硬把这场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惨败说成是胜利，诬蔑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江青算老几，也想出来指点江山，甚至妄想以慈禧自居”，“姚文元以前也是个无名小卒……真是蜀中无大将，猴子成了王”。银川市革委会保卫部于1970年以现行

反革命抗改罪判处朱守忠死刑。1979年11月14日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撤销了自治区革委会保卫部判处朱守忠无期徒刑的判决，并指定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79年11月20日撤销原判，宣告朱守忠无罪。

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又于1980年5月20日作出决定，授予朱守忠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并分别发出文件号召全区各族人民向余渭国、朱守忠学习。国家民政部于1986年6月21日批准追认朱守忠为革命烈士，其事迹陈列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笔者看了朱守忠的事迹，最为感叹的是他在“思想演变”中的最后一段文字：

“一朝天子一朝臣，朝朝天子出忠臣”，是历史事实。古今中外，都是一样。但所谓“忠臣”也者，毕竟是寥寥无几，可怜到极点，而且十九死于非命，不是被人忌害，就是坐以待毙。原因很简单：因为“忠臣”在社会上是没有市场的，到处吃不开。客气一点，则敬而远之，不客气一点，则嗤之以鼻。不是笑他为“愚忠”，就是讽他为“傻瓜”。一言以蔽之，常为一般正常人所不齿。要想改变这种现状，更是难乎其难。即使剖心直谏，也是白白送命。

正是活灵活现的朱守忠自我写照。可悲，可敬。

余渭国

余渭国，男，1936年生，原籍上海市人，1952年加入共青团，1959年由北京地质学院毕业，先后在国家地质部白银研究队、综合物探队工作，1960年调宁夏地质局物探队、水文队、地质学校工作。余渭国常年战斗在条件十分艰苦的野外，为宁夏地质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1970年3月30日写出了《砂不见木》的讨林檄文，其中有：

我看到了一个大的不得了，了不得的庞然大物，我能怀疑他吗？尽管他有点秃……并洋洋得意地宣称他在大树底下乘凉呢！他‘战功赫赫’，‘举世公认的毛主席的当然接班人’，这一点已载入‘党章’。记得日本报刊评论他是‘天才’的军事家，《星火燎原》上有很多高级将领大谈他那套几面几线的战术是如何的‘灵验’。这么一个大人物我再去碰他一下，不是有明文规定是现行反革命吗？可是形势却逼着我上梁山……我深信判决的决不止我一个，而是一大片，也有德高望重的朱总司令（历史上形成的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却被他搞了个突然袭

击，被贬成‘饭桶’不算，还有‘野心’）……且看日本帝国主义的爱憎：‘朱毛两命亡’，而林彪却是‘天才’的‘常胜将军’，见鬼去吧，‘常胜’将军，你这‘常胜’骗不了人，打倒林彪。

为此，银川市革委会保卫部依照“公安六条”，于1970年4月1日将他逮捕。

在审讯中，余渭国仍坚持自己的观点：“林彪提出突出政治，我认为是唯心主义的，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这句话是完全错误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人说的话，哪能完全是对的？……他这样一搞，实际上把毛主席搞成偶像了。毛主席的思想有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有的还要发展，通过实践检验。”

“林彪的突出政治也是形而上学的东西，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是大毒草，这不是人民群众所接受，而是强加在人民头上。”

关押期间，有人劝他：“只要认个错，还有悔改的机会。”他却坚定地说：“我不想让他们从宽处理，就是他们打死我，枪毙我，我也不会改变观点，我不过是喊出了人民的心声，历史将证明我无罪。”

1970年4月1日，余渭国被银川市革委会保卫部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

1979年6月5日，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宣告无罪，彻底平反。6月7日，追认余渭国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据《宁夏审判志》记载：

原宁夏综合地质大队物探技术员余渭国，于1970年3月30日写的《砂不见木》一文中，反对把林彪吹捧为“天才的军事家”、“常胜将军”、“举世公认的毛主席的当然接班人”，反对林彪贬低、迫害德高望重的朱德总司令，公开提出“打倒林彪”。余渭国因此于1970年4月27日被逮捕。在审讯中，余渭国仍坚持自己的观点说：“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这句话完全是错误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人说的话，哪能完全是对的，他这样一搞，实际上把毛主席搞成偶像了。……他（林彪）的突出政治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是大毒草，这不是人民群众所接受，而是强加在人民头上。”银川市革委会保卫部于1970年4月29日将余渭国判处死刑。1979年6月5日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对余渭国宣告无罪。

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于1979年根据余渭国生前的意愿作出决定，追认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又于1980年5月20日作出决定……分别发出文件号召全区各族人民向余渭国、朱守忠学习。

余渭国写了《砂不见木》后，是寄出去了，还是被人发现、遭人揭发了？不知道。不过，仅仅这一段文字，已令笔者拍案。难以求得全文，长令笔者扼腕。

“共大案”

“共大案”指的是宁夏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一案。

文化大革命中，大批知识青年，自愿或不自愿地奔赴农村。其时，无论是留在城里的还是去到农村的，都患上了精神饥渴症，尤以去到农村的为甚。一个几亿人的国家，八个样板戏，能不患上精神饥渴症么？故而觅书成瘾，相互交流心得，志趣相投者彼此相惜，形成了不是组织形似组织的亲密关系。不过其中的多数，对于政治涉猎不深。

从政治上说，很多青年或多或少受了毛泽东的“世界是你们的，做事要大家来”，你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的影响，政治上多少被激发起了一种责任感，再加上毛泽东青年时代如何奋斗的故事的流传，现实生活中种种怪现状，更激起他们思考的热情。

但是，虽然毛泽东的青年时代是可以说政治上极为自由，要成立一个组织，要发一个征友结社的号召，比打个喷嚏还容易，而当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情势就完全不同了，到了文革，更是登峰造极，当局最恨的是异议，最忌的是组织。这下，一些有志向、有抱负而又对社会有独立思考，能进行分析研究的青年便要遭殃了。如果既有思想、言论上的叛逆之处，又有形式上的类组织形式，那是非遭殃不可的。

笔者至少看到了文革中有四个这样的团体，都有着类似的命运。

一个是宁夏的“共大案”，结果是三个死刑，五个徒刑，其余的受到拘捕关押和在本单位隔离、批斗。

一个是南京的以查全华为首的“共产主义小组”，共有 11 人。结果是一人死刑，五人徒刑，二人戴反革命分子帽子，三人免于刑事处分。

第三个这样的团体在延安地区。《延安地区审判志》有文字如下：

洛川县 1971 年判处的“黑青军反革命集团案”，涉及 19 名返乡学生，他们互交朋友，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小组，制定学习计划，相互写信勉励，里边没有一句反对中共的话，当时竟以“越写得好看，反革命目的越隐蔽”的荒唐逻辑，颠倒黑白地将他们的学习计划和私人信件当做“反革命纲领”，将学习小组定为反革命集团，其中 3 人被判刑，给所谓首犯判刑 20 年，主犯判刑 15 年。

第四个是黑龙江边陲的一座煤城的“共产主义小组”，于1968年7月2日，在大街的醒目处，张贴蜡纸钢板油印的传单。其内容是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个人迷信，反对大学停办，并引经据典地说“文化大革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鼓吹人们抵制这个运动。案破后六人被判死刑，当场枪决。其余的分别被判死缓、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不等。其中四人逃往苏联，两人被递解回国，一人一年后潜回国内，据说是受苏联派遣充当苏修特务，也被枪毙。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政策时，未死者被释放，并都安排了工作。死者平反与否，因未见到公布，不得而知。

上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到处招商引资，逃苏的吕守福从俄罗斯回国探亲，据说是他在俄罗斯娶了一个俄罗斯靓女为妻，并当上了一个皮革厂的厂长。回来时市政府曾设宴款待。昔日死囚犯，今日座上宾，因祸得福，让人嗟叹。

所谓“自修大学”，明显的是从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湖南自修大学”而来。其目的就是走毛泽东的路，探求救国之道。连生活习惯都仿着毛泽东：不抽烟喝酒，不拿公家的财物，生活简朴。不谈金钱和物质享受。他们的最冤之处在于他们不知道毛泽东走过的路已经堵死了，不允许再走了。真理的探求也已经结束了，不可以再探求了。于是，他们的命运也就决定了。

“共产主义自修大学”是由13名六六、六七届大、中学校毕业不久的学生（其中5名共青团员，3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于1969年11月在银川成立的自学组织。吴述樟在宁夏西吉县插队。

他们最大的26岁，最小的21岁。这个组织成立后，他们在“共大守则”中明确提出：要“培养和造就一批真正地而不是形式地、踏实地而不是虚浮地、勇敢地而不是怯懦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有政治远见、具有独立的思想和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探索并了解现代社会的运动规律，誓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强的革命战士。”“积极从事于世界民族民主解放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现形态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诸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探讨，同时紧密地结合现代实践的社会斗争和改造。”由于成员不在一地，所以“守则”还规定，“共大”是以“刊物为中心，通过自修与交流讨论相结合的方式学习。”

秉承着这样一个目的，自修大学的成员们在他们的油印的刊物《学刊》上刊登出一些理论研究的文章，在组织成立的前后两年内，《学刊》上先后刊登了他们二十多篇文章和笔记，他们带着现实斗争提出的各种问题，通过阅读马列原著，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这些观点有些很具有现实意义，比如鲁志立在《什么是法西斯主义》中写道：

禁止一切为世界公认的民主权利，以至人民的思想 and 言论自由，残酷镇压一切反对或仅仅不同意暴力统治的人民，甚至采用公开的恐怖手段。

竭力推行种种仇视人类的反动谬论，例如宣传种族优劣论，反动血统论、人为制造阶级与阶级划分论等，来迷惑笼络一部分人以达到镇压人民的目的。此外还竭力推行愚民政策，实行奴化教育，提倡奴隶主义的盲目服从精神，宣扬个人迷信和领袖至上的神话，从意识形态上已堕入了完完全全的唯心主义。

再比如吴述森在《迎接七十年代的一个春天》中提到：

革命就是批判，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批判，揭露矛盾，正视斗争，批判现实中不合理的内容，在批判旧世界的基础上，开创一个崭新的社会。

二十世纪初，列宁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通过五十多年的实践以后，我们今天需要强调说，承认阶级斗争，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并且同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从有阶级到无阶级的过渡，是消灭阶级的手段，而不是制造新阶级，实行权力、财产再分配的变革，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这个组织成立后，自筹经费刻印过两期“学刊”，刊登了社论等6篇文章和3篇农村调查报告。其中说：“现在的形势类似辛亥革命的形势，也有个窃国大盗袁世凯，企图利用文革篡权，此人就是林彪。”吴述森多次说到：“林彪没谈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大谈政变历史，纯粹是封建社会那一套。”“林彪根本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主要罪名是“书写各种反动的论政文章”，其中主要就有前面引用过的鲁志立（北京农业大学一九七〇届毕业生）撰写的《什么是法西斯主义》中那些话。

1970年3月12日，吴述樟第一个被捕，其后，其他成员陆续被捕。6月11日22岁的女共青团员熊曼宜从隔离室逃出自杀。

在平反冤案时出版的《春风化雨集》（下册）里《追求真理的青年》一文中，引用了当年审讯吴述森时的几句话：

审判员：你们“共大”是什么组织？

吴述森：研究、学习马列的学习组织。

审判员：你们研究的出发点是什么？

吴述森：为了探索社会运动发展的规律，为了加深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我们不是反革命。

8月的一天，人口仅三十万的省会银川市将近十万人挤满体育馆看台和四周的街道，观看对“共产主义自修大学”成员的“公开宣判”。“共产主义自修大学”中的吴述森（宁夏大学毕业生）、吴述樟兄弟和鲁志立三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中，吴述樟最大的“罪恶”是：曾在《人民日报》上引用的林彪一句有名的话“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旁边批写过“放屁”二字；吴述森在《迎接七十年代第二个春天》这篇《学刊》社论中写道：“革命就是批判，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批判，揭露矛盾，正视斗争，批判现实中不合理的内容，在批判旧世界的基础上，开创一个崭新的社会。”被判定为“阴谋以反革命的暴力推翻我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另外几个成员中陈通明被判处无期徒刑，徐兆平被判处15年徒刑，张维智被判处8年徒刑，张绍臣被判处3年徒刑，其余6人受到拘捕关押和在本单位隔离、批斗。受他们牵连的东北工学院学生刘唯勇被判处三年徒刑后死于狱中。

陈通明在狱中通读了《马恩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及其它书籍，写了四十万字笔记。同时一次又一次给党中央、毛泽东写申诉信。家人劝告他：“你的减刑和释放是有希望的。”他写信说：“我要的是集体的无罪，真理的无罪！请不要为我个人的早释奔忙。”还在信中说：多去看看吴述樟的小弟弟，多照顾熊曼宜的母亲、妹妹，设法弄些马列的书给张维智。

残害有志青年的文革终于被否定了。1978年8月5日，宁夏党委和革委会在银川市召开大会，为“共大”冤案平反，为死难者昭雪。

《宁夏审判志》对“共产主义自修大学”一案记载：

……因组织学术团体、学习探讨理论问题，利用书信或未公开发表的文稿交流心得体会，痛砭时弊，表露对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和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情绪，从而被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地无限上纲，以“反革命集团”或“恶毒攻击”的罪名处以重刑。吴述森、吴述樟（二人系同胞兄弟）、鲁志立等13名大、中学校毕业不久的学生，为交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而于1969年11月在银川市成立了“共产主义自修大学”（简称“共大”）。由于其成员不在同一地区和单位，以“刊物为中心，通过自修与交流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学习”。他们自筹经费刻印了两期《学刊》，共刊登六篇文章和三篇农村调查报告。在这些文章中，曾对“活学活用”、反动的血统论、打砸抢行为表示了强烈不满。而原判认定该组织是“打着研究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号，进行旨在推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反革命组织”，“是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策略、有言论、有行动的现行反革命集团”，“是一个十足的帝、修、

反的别动队”。银川市革委会保卫部于1970年8月21日以“现行反革命集团罪”判处吴述森、吴述樟、鲁志立死刑，陈通明无期徒刑，徐兆平有期徒刑十五年，张维智有期徒刑八年，张绍臣有期徒刑三年，交群众监督执行，对杨非免于刑事处分，对“共大”的其他成员杨树立、李坚、赵群、孙阴轩、熊曼宜(已自杀)不以反革命论处。1976年3月，原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看到此案的申诉信，即批示公安部派员到宁夏进行了解。经初步调查，认为此案定性不确，建议复查。但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此案久拖未改。1977年8月16日，根据中共中央领导的批示，由国务院知青办、公安部、北京市知青办、自治区银川市公安、法院等单位共同组成联合复查组对此案进行了复查。经复查后认为，吴述森等13人组织“共大”及其所写的文章是有觉悟和进步的表现，应受到支持和保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1978年4月14日撤销原判，对吴述森、吴述樟、鲁志立、熊曼宜平反昭雪，对陈通明、徐兆平无罪释放，对张维智、张绍臣、杨非宣告无罪，对杨树立、李坚、赵群、孙阴轩恢复名誉。

1978年9月29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宁夏为惨遭林彪、“四人帮”迫害的青年昭雪/区党委和革委会在银川市召开大会，撤销对一九七〇年八月判处为“现行反革命集团”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一案的判决，并做好善后工作》的报道和评论员文章《革命青年的锐气是扼杀不了的》。报道中说：

在复查中，根据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六条标准”，对这些文章、书信逐篇进行了分析，认为其中绝大多数属于理论学习、研究和探讨性质的，没有原则性的政治错误；有些问题是属于认识方面的，理应通过学习、教育和批判去解决。当时，某些办案人员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无限上纲，轻率定性，硬给“共大”成员加上了“现行反革命”的罪名。特别不能容忍的是，文章中一些本来是正确的论点，也被当作“反动言论”和定罪的依据。

不过就是一些“文章、书信”，所进行的无非就是“理论学习、研究和探讨”，得到的竟是如此结果。据说，这个案子得到了华国锋的关照，报道说：

一九七六年三月，华国锋同志看到关于此案的申诉信，立即批示公安部派人到宁夏进行了解。

“共大案”的受害者代表在发言中激动地说：英明领袖华主席把我们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强加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目前，我们都已恢复工作，得到妥善安置。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我们的大救星。

华国锋的这一批示是值得肯定的。不过，江西的李九莲于1976年12月，写了《我的政治态度》，认为“华国锋把党政军大权独揽于一身”，“是资产阶级野心家”，“寄希望于江青”，于1977年12月8日被判死刑。不知华国锋知道不知道？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开头是这样说的：

在林彪作孽、“四害”横行的时候，以种种罪名打击干部，迫害青年，制造了大量的冤案、错案、假案。今天本报介绍的遭到林彪、“四人帮”一伙残酷迫害的一批知识青年，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

这是一批多么可爱的年青人啊！他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关心国家大事，关心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积极投身到火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去。他们一面在农场、社队、工厂中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在三大革命运动中进行锻炼；一面刻苦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钻研革命理论。为了探讨革命真理，交流学习心得，他们一度组织了“共产主义自修大学”这个自学组织。他们的所作所为，是符合毛主席的教导，符合党和人民的要求的，反映了我国新的青年一代的革命主流。就是这样的一批好青年，却被林彪、“四人帮”一伙蛮横地打成“现行反革命集团”。

“这是一批多么可爱的年青人啊！”说得太好了。其实，还不止是“年青人”，朱守忠、余渭国这样的中年人不可爱么？可惜他们生不逢时。

不过，从另一方面说，他们也是生逢其时——“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这才让他们的生命发出异彩，流芳百世。